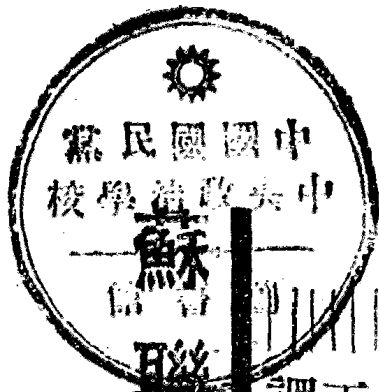


蘇聯第二大戰

蔡葵士著 方正譯



新生命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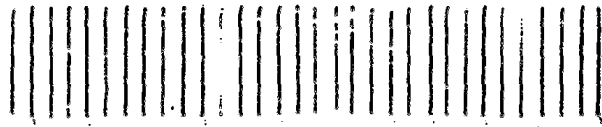


著士葵蔡

譯正 方

蘇聯與第二次大戰

新生命書局發行



蘇聯與第二次大戰目次

〇一七三

一 緒論.....	一四
二 蘇聯的戰爭心理.....	五〇
三 蘇聯與歐洲各國的衝突.....	九六
四 和平的展望.....	一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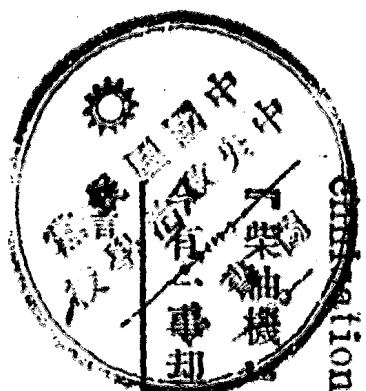


目次

董仲舒



512.70
560
2



CHINA (Tampoco)、農業集團化、文化革命與技術的克服、教育實用化 (Polytechnic) (若照字面譯則為教育包含多種技術化)、以及 (Diesel engine) 的得勢等等，依舊帶着幾分新奇的意味，不過如布爾塞維克在社會及經濟組織上所作實驗的一

緒言

關於蘇俄，我們現已不愁缺少新聞資料了。固然，那些新奇字眼——代表新舊各種力量與人類動力，出人意表之混合的新奇字眼——如五年計劃、實業化的



(南)

大部分，已經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的功績。這就是如同說：這實驗的一大部份業已形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型態了。大概在未來的一段時間當中，蘇聯制度在某幾種事物上仍將繼續其試驗，尤以個人自由方面爲然。但無論如何，蘇聯制度確已進入與全世界挑戰的境域，則又爲有目共見，不容置疑。

這已是非常明白的事實，我們要想裝聾作啞，佯作不知，也是無用——我們英國或者是最不作這樣想的罷。那種自己欺騙自己，如駝鳥見人追擊而趕快把頭往土堆裏埋藏的最愚蠢不過的方法當然太不體面，但不幸這正是一般英國人對於蘇聯一向所持的態度，而同時英國的經濟狀況又已到了這樣嚴重而危急的地步，不容我們再事保持那一向的態度而拖延下去，否則恐怕真將前途不堪設想了。只是一味地把莫斯科的救世福音置若罔聞不加可否，恐怕其結果將比正面反對還要不好。實實在在，我們不能老是這樣坐享清福，掩耳不聞蘇俄的事，因爲這一點

清福要以不太小的代價來換得，牠不但會予蘭開夏、南威爾斯和克萊德（Clyde）等處加倍的煩惱，會予白屋街（Whitehall）更多一點的不安，牠簡直會使整個英國發生混亂。總之，英國的政治家們不能像三歲孩童的自己哄自己，躲着不去和那般可怕的布爾塞維克們周旋一下，要就除非他們爲的求自己的驕傲和優越，繼續維持下去，而不惜以整個國家供其犧牲，倘真如此，則我們又復何言！

蘇聯向全世界的挑戰，僅爲時間遲早的問題，而不是根本有無的問題。不消說，最好還是早些發作，因爲就連一般經濟專家也已有出危機的來臨而深爲恐懼。他們覺得我們目下的經濟制度，其已在敗毀中的構造，不久將因在這個貧窮世界當中的『過剩生產』的無法解決而終於傾覆到我們的頭頂上來。若夫對於上述的這個挑戰將以何法去應付的問題欲加肯定則勢不得不一考馬克斯之學說，尤其要緊的是下面的這個立論。即基本的經濟改變不能少去武力的社會暴動。不過

直至如今，這樣的一個立論，却不是普通一般社會主義者，尤非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所能賞識，猶之乎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的宣傳家之於國家統制說一樣。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辯白道：英國畢竟是英國，按步就班的特性乃英國政治習慣中之骨髓，牠是萬難去除的。

也許是的。但愚見以爲：即令俄國的情形有牠自己獨特的歷史關係，即令英國從來沒有突然地採用過任何試驗，即現在亦復如此，但不久的將來，馬克斯的這樁案子總得要我們拏點勇氣出來研究一下。本文目的即在此，但僅屬消極的作用而非積極的作用。我們是要討論：怎樣去避開蘇聯的挑戰，不是要討論，怎樣去應付牠。

蘇聯的挑戰不當以戰爭爲其解決的方法該是衆口一辭的最高理想罷！

戰爭嗎？人非白痴，有誰渴望與蘇俄打仗或與其他任何國家打仗——至少在

英國，沒有這種人，除掉那幾位生來好打架的另當別論。我們好享清福的人也許會補上一句『和那些混蛋的法國鬼也犯不着打』。『嘿，有誰願爲戰爭而犧牲，』他們接着說，『我們英國，沒有人想炸毀克列姆林宮，沒有人想把所有的共黨捉來槍斃，也沒有人想用毒瓦斯去毀壞蘇聯的集合農場。你想我們要跟足有一洲大的俄羅斯開戰嗎？不，那兒的話。和平的意識現在英國正是甚囂塵上，深入人心。其勢遠過往昔多矣。我們大概是準備實行軍縮了。幾年之前，我們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感覺如何，我們現在不問，別人家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感覺如何，我們現在也不問。英國反正是站在和平這一方面，決無錯誤，決無含糊的。況且挑戰也好，不挑戰也好，我們何苦爲了這事而亂動干戈呢？』

以上這一大段話，倒是很有道理的。就我們目下的情形而論，和蘇俄開戰簡直是太不可思議的事了。照這樣說，我們不是可以高枕無憂了嗎？不過，在認定

與蘇俄開戰全爲過慮之前，我們却有明白以下兩點之必要。一、假定有上述的戰事發生，決用不着英國單獨自己去對付蘇聯。二、就以往來觀察，戰爭固非衆人所歡迎，但其爲經濟原因上之一種需要，却甚明顯。戰爭之爆發，與其說是由於『人民的意志』——說是由於政府的獨斷行動自然離題更遠——這樣一個空泛的東四，倒不如說是由於許多經濟利益的衝突。同樣，戰爭之避免，與其說是由於人們愛好和平之情感，倒不如說是由於相互間之經濟諒解。概括地講，戰爭是起於許多複雜的因子而非由於一個單獨的原因。本來在這許多因子當中，也許有幾個是並非卑鄙的。不過在現代文明國家當中的戰爭，其原因却全都以經濟條件爲斷，這又是不容我們否認的。那些和平主義者盲目地謳歌和平主義之偉大而不肯稍着眼於國民經濟之許多對立現象和那些坦白事實，他們的那種昏迷不堪的唯心論，爲害之大，即與窮凶極惡標榜侵略主義的政治家的好戰性比較，也是時常有

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現代歐洲的和平問題簡直就是國際間經濟妥協與合作的問題。

今日歐洲已組成若干敵對的武裝營壘，其原因即在各國間之缺少一種經濟諒解有以致之。如今敵對的陣勢已極嚴肅而顯露了。誠然，自凡爾賽條約以還，全歐戰爭空氣之復趨濃厚，那種各各秣馬厲兵爭先恐後的情景，恐未有甚於今日之局勢者。這種敵對的空氣本由商業競爭一手造成，今但聞官方之闢謠，或徒見民衆方面對於和平維護之真誠而私心竊喜，豈非咄咄怪事？不幸，破壞和平的力量大都不以人意爲轉移的。

這一層道理，布爾塞維克的領袖早已明白，而同時那偌大的蘇聯民衆也已得到前者的訓示而領略及之。共產黨根據今日的歐洲局勢，確信不久的將來，戰爭必會發生於歐洲，無可避免。同時，無論戰爭是因何而起，但結果將成爲大家來

對抗蘇聯的形勢，則亦事之無可避免者。他們雖然明知歐洲各國的重隊還不能佔蘇聯的整塊疆土，但能予蘇聯以無限量的損害，却爲意中事。共產黨真是畏懼這樣的一場戰爭的來臨，在過去他們畏懼着，如今他們仍舊畏懼着，而且加倍地畏懼，這沒有別的，就是因爲這樣的一場戰爭將於他們大有不利，恐怕過去三年的苦心 and 犧牲，頗有毀滅於一朝之虞。可是共產黨人卻偏深信這一場惡戰的無可避免。他們覺得：這場戰爭不但爲仇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一切勢力所支配，實更維繫於以下的許多條件：如資本主義的危機、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對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威脅、資產階級社會之整個結構的崩潰、和那很重要的唯物史觀的法則等。共產黨人把這種認識奉爲金科玉律，不讓人家對他發生一點懷疑。

在一九二七那一年，共產黨曾經一度爲了對於歐洲之一國或幾個進攻的恐懼而耽阻不安，當時他們那種機警的神情瀰漫全國，有時其神經過敏之處誠堪令人

發笑。凡在那年之後到過蘇俄遊歷的人們，沒有不感覺到以下這一件事的，就是蘇俄人民均一致確信：對抗蘇聯之戰爭就要在未來的幾年之內發生而萬難倖免。

蘇俄人民對於戰爭的預測既如上述，但和這種心理互相對照的卻有一般外國人的適成反比的觀察，至堪注意。這些外國人簡直把戰爭這回事當作耳邊風，目為無稽之談。他們舉出山唐寧街或蓋陀賽 (Quai d'Orsay) 對蘇聯宣戰的一些實在的阻礙。這些從蘇俄遊歷歸來的外國人於無意中也觀察到蘇俄人民對於戰爭的機警心理，他們說：『蘇俄的人民相信不久又要有大戰發生了，並且這一次將為對抗他們的，』接着他們便隨意地述說莫斯科電車之擠擁情形，或蘇俄的離婚程序。但是誰要是近幾年來常常閱讀蘇俄新聞的，或是曾經聽到蘇俄的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沈靜地討論着下一次的大戰的，抑或是曾經目擊例如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種種活動當中的特點的，都決不能作那樣清閒的觀察。不過在從前，那些共

產黨領袖，那些在政略上其老練決不讓於歐洲外交家的共產黨領袖，也許是會爲防禦與宣傳的雙重目的而故意這樣大吹大擂，一若戰爭之將臨，這例也是極可能的。可是現在情形又有些不同，假如那些不肯相信戰爭會發生的外國人，肯不憚煩地去一領教今日這些共產黨領袖所抱的觀點，我敢保他們不會將戰爭的恐怖言過其實，而同時，對於歐洲的軍事上的準備和蘇聯之防禦上的預測這一個遙相對立的景象，我也敢保他們不會像先前的那樣安閒自若而漠不經心。

維護和平的人當中，能够注意到共產黨對於歐洲未來戰爭之經濟原因的分析的人，實在太少，這誠屬不幸，但那些歐洲政治家，對於蘇聯之戰爭心理其於歐洲之軍備與和平之前途的影響上，也同樣地漠不關心，置若罔聞，則其各難辭了。

依我看來，共產黨的經濟分析與蘇聯戰爭心理的影響這二者的重要，此間沒

有多少人能領略。經濟分析的真理，或其中所包含之真理份子，終究是會自然而然地爲我們所注意，而且就是晚一點認識牠也無關緊要的。但說到蘇俄對於歐洲未來戰爭的恐懼與預測就不能同日而語了。有時，共產黨們自己也會希望他們的那種論理是不完全對的，他們正是巴不得當戰爭爆發時，蘇俄能夠保守中立，他們更希望戰爭只是歐洲各國互相廝殺的事情，且在牠們因同仇敵愾與利益衝突的場合之下，不能對蘇聯採取一致的行動。不過他們可又覺得這種希望太渺茫了。他們究竟覺得歐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輪到末尾還是會一時捐棄成見而共同對抗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這樣的好終局也許還要等待些時日，不過在四方充滿着激動空氣的場合之下，蘇聯的中立恐怕不能保持多久罷！總之，第二次大戰的焦點必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個世界的最後決鬥：那就是共產黨之分析的第一個而也就是末一個的真理所在。

讓蘇聯存着一種心理以爲對抗他們的戰爭不久即將爆發，真是萬分危險的事情。雖然他們的那種見解有許多地方應由他們自己去負責，但是我們局外人也並非沒有貢獻他們許多足以助其見解之形成的材料，所以事情不是單方面的，我們須由雙方去觀察才對。因此之故，我認爲最好將我們的工作分爲如下的三部：

- 一、對於現下正在蘇聯流行的那種戰爭心理，試爲概括的紀述；
- 二、對於從歐洲武裝干涉直至最近布爾塞維克信世界革命之可望實現的一個時期當中，布爾塞維克與歐洲間之衝突，就其原由之較爲重大者，加以審慎的探討；
- 三、把蘇聯對於歐洲的軍縮與和平工作，尤其是像行將於本年二月三日（指一九三二年）在日內瓦召集的軍縮會議所能給予人們的一些機會，其在恐懼與見解方面的實際表示，試爲較詳的論述。

軍縮會議，在最近時間的限度內，或者還能求得一種和平解決的方案而不致

完全無用。軍縮會議有力確定下面的這一件事，即：蘇聯對於戰爭的預測——無論其爲一開始卽爲反布爾塞維克的戰爭抑或是逐漸才變成這樣的一種戰爭——是否爲根據目下歐洲的軍備和陣容而下的一種合理的解釋或推論。倘如歐洲慨然地實行軍縮，則一切經濟上的衝突，就何以迎刃而解。就算退一步而假定不能完全解決，也至少可到無關大體的程度了。但是使歐洲不能，或定不肯實行軍縮，則經濟上的衝突又勢不能不早晚取決於砲火與血之一途了。

但是蘇俄對世界的挑戰不能就這樣地消滅的。恰恰相反，恐怕還要發生。因了歐洲大規模的戰爭，結果將促發東方國家及各處的大革命，並促成世界共產主義之新紀元這是無可懷疑的。那些明白的布爾塞維克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不過那些明白的布爾塞維克是揀選犧牲最少的一條路走的，所以在這一層，他們並不比那些明白的歐洲人不謹慎。在布爾塞維克看來，在歐洲的遺址上重建共產主義

或其他事物，究竟不是能令人滿意的事。

二 蘇聯的戰爭心理

外國干涉的教訓，蘇聯政府沒有忘記，蘇聯的人民也沒有忘記。差不多緊跟着十一月革命而來的便是歐洲向蘇聯的進攻，這種進攻的頭一陣便是捷克斯洛伐基的大批人馬，他們由一些反革命的軍官統率着，他們受協約國的接濟。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天，經過了長期的驚慌與混亂，英日的聯軍佔據了海參威，英法的聯軍佔據了穆爾豪斯克，而聯盟國的軍隊也佔據了阿堪遮。新舊二大陸都採取了對

蘇聯實行軍事干涉的政策。爲了上述的軍事干涉；英國花了英金一萬萬鎊，日本花了英金八千萬鎊，至於法國所耗費的數目——大都爲接濟捷克、波蘭和羅馬尼亞而花去的——則尙難查考，姑付闕如。美國在這個上面所用的金錢也和法國的一樣，無從查考了。蘇聯是承繼一個因大戰與沙皇之柔弱無能而完全入於傾塌狀態的國家，故這種干涉對於她的損失，自非數字所能形容。她所花費的是：接連三年的內亂與飢荒，和事實上對於她的實業與財政方面的來源的完全破壞。

蘇聯沒有忘記他們這種爲自己生存而競爭的一段初期歷史。他們的抵抗雖得到勝利，但一時也現出有點精疲力盡了，但是他們始終看透歐洲的其餘各國對她的敵視態度。她這種奮鬥給她孕育一種很爲積極的國家主義，再因爲她受了歐洲的經濟封鎖和深感於其本身之孤立於四面資本主義國之中，她的國家觀念因而益形濃厚了。在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裏實現社會主義的種種困難又使得他的這種國

家觀念更加尖銳化。在以往歐洲未嘗與布爾塞維克講和，這是非常清楚的，而同時，在最近的將來，牠也不會做到這一步，這也是差不多可以下斷的。

列寧說過：「無力自衛的革命不能持久。」蘇聯已經取得寸許透氣的地方，現在他們要為共和國的自衛而商定大計了。共產黨裏沒有人懷疑這一點：第二次向蘇聯的進攻隨時都有發生的可能，而且這種的進攻是由無論那一邊也都是可能的。「歐洲正準備着和蘇聯開戰」。『資本家們正在想着種種的陰謀詭計和蘇聯的人民開戰』。「克雷蒙梭恐嚇蘇聯的民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準備着和蘇聯開戰」。「皮爾蘇斯基恐怕馬上就要動手」。「各資本主義國家正聯合戰線來對付蘇聯」。共產黨將以上這些警語再三再四的對蘇聯大眾講述。無時無刻他們不在警告民衆那與全個仇敵世界對抗的決鬥的將近，而勉勵他們作未雨綢繆的準備，共產黨們說：『準備着保衛你的社會主義的祖國罷。』這便是共產黨在從一

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這一個期間當中所予蘇聯大眾的珍寶，而同時蘇聯在所述的一個期間當中的外交政策也反映出下面的兩種心理，比任何事物都清楚的，其一就是缺乏安全的感覺，其二便是對於爲人所侵襲的恐懼。

上面這些都是歷史。固然，我們須將蘇聯的戰爭心理的成長及其緣由作一較爲縝密的探討，但是爲着這種探討的便利計，我們有先將目前蘇聯的戰爭心理的背景敘述一番的必要。

二

自從蘇聯內爭終了以來，蘇聯的領袖人物便一直相信：歐洲畢竟是要向「布爾塞維克主義」宣戰的，現在祇是在等待着良機而已。蘇聯式的宣傳是有名厲害的，那末他們民衆方面的信仰也就可想而知。就作者個人的經驗和目見耳聞的來

說，一個外國人而想改變一個俄國人對於這件事的信心，簡直是事實上決不可能的事情。如今蘇聯的人民已經打算公然地承認：他們從前的恐懼乃是未到期的流產，不過他們並不肯承認：他們的恐懼是一直沒有根據的，或是現在有什麼理由可以教他們把固有的恐懼拋開。比方說罷，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英蘇間的情形日趨險惡，大有彼此斷絕國交的形勢，但是這個机阻不定的局面遷延了好幾個星期，到了最後，貝爾福爵士的一番論調卒將僵局打開。無論如何這總算是一個驚人的論調，而同時他在蘇聯對於歐洲的懷抱的觀察上，也不無些須影響。雖然當時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不過蘇聯報章上所揭示的驚慌與對於外國的詈罵，確實予人以不祥之兆。英蘇間的斷絕國交即於次年五月間實現，那是正在駐倫敦的蘇俄合作社爲英國警察搜查的事件發生之後。所以預言的頭一半已經應驗了。於是莫斯科人心惶惶，談虎色變，全城頓呈不安之象，在接着的後幾個月當中，戰爭心

運的緊張，到達極點。布爾塞維克的領袖份子沒有能夠還是鎮定如常，毫不受其影響的。史達林當時對於此事的關切也不在旁的領袖之下。當時個個人都以為時候到了，於是街頭巷尾，都是異口同聲地談論這件事。他們想：英國的承認蘇聯政府會使旁的國家作同樣的舉動，現在英蘇斷絕國交，這回旁的國家不見得不會再步其後塵。這便是戰前的一幕。布爾塞維克更進一步地推論：英國一定不親自出馬的，她讓皮爾斯基和波蘭的師旅替他動手不是省事許多嗎？

英蘇二國邦交之破裂，其結果却並不如布爾塞維克們在事前所想像的那般嚴重，故在那些戮力促其實現的人們，未免大失所望了。雖然這一場驚擾便由此慢慢地消沈下去，可是與安全的地界，則仍舊距離太遠。因為歐洲對於蘇聯的態度，根本還是仇視，而戰爭的因素也依然存在——要是教共產黨看起來，則其危險之程度，正是有加無減。不過他們似乎一致地看清了這一點，就是：歐洲多數

的國家一時爲了新發生的許多經濟難題而弄得手忙腳亂，應接不暇，因而只好暫且不來干涉蘇聯，一切容待日後的措置。這樣，蘇聯便立刻抓住了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來開始『社會主義之建設』的大業，俾能偷偷地猛進。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蘇聯採取了『五年計劃』，從此她的戰爭心理也就轉入了另一頁。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蘇俄革命在政治上的挑戰還未曾脫離人們的腦海，而經濟上的挑戰却又接踵而來了。我們能應付牠嗎？如其能夠應付，則又是怎樣的方式呢？蘇聯的領袖不但爲更厲害的經濟封鎖而準備着，他們而且預備立時的軍事侵略的發生，這是因爲對於五年計劃抱有無窮希望之故。這時戰爭的恐懼又復活了。這個計劃的進行如何，起初本極渺茫，無人敢下斷語，故當時國外輿論對於這個力謀全國實業化的疾速完成的近於空想的計劃，以蔑視的居多，這也不足怪。當五年計劃著有相當成效，歐洲各國已經不能不承認：雖然這個計劃

的整個實現固似爲事實所不許，但其在某幾方面，確已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的時候，蘇聯的領袖們，又睜大着眼睛望住局勢的變化了。歐洲要用什麼方法來打倒這個五年計劃呢？依這些領袖們看來，對民衆的警告又是不可少的了，而且是比從前更加不可少。較充實的軍備——那是說，防禦外患的軍備——也當然是不可少的。共產黨們這樣說：當蘇聯的大衆正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時候，那個資本主義世界是決不肯完全袖手旁觀的。他們說：『我們的五年計劃越有成功的可能，就是對付我們的這場戰爭越加緊逼。』他們對於這個計劃的信心非常堅強，所以他們更進一步肯定說：『這個計劃一定是要成功的，所以這一場戰爭也一定不免。』這的確是很新奇的論理，也許是俄羅斯式的論理——不過蘇俄的人民却都一致地這樣相信，我們又有何辦法？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這種狂熱的戰爭心理似乎平下許多，而歐洲對俄戰爭之終究不免的這個牢不可破的觀念也變爲

一種哲理上的見解，關於後面的這一個事實，乃是一個留心觀察的外國人很容易便可以發覺的。

不久，那『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決定成敗的第三年』的末尾也到了，這時全世界的經濟恐慌鬧得很兇，結果：一方面牠給蘇聯的恐懼助威，一方面更充分地證實蘇聯式之經濟組織的合理。這樣，蘇聯的戰爭心理復又轉入於另一頁，或許是最末之一頁，也說不定。依共產主義之先知的眼光看來，目下資本主義制度已在崩潰着，她已無力解決她本身的問題。據共產主義的理論來講，這個恐慌最近的發展業已揭示：牠沒有復原的希望。今日共產黨明白地宣稱：馬克斯主義之診斷的真理，根本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挑戰。所以這兩個勢不兩立的經濟制度的無可避免的衝突必要發生。所以這兩個互不相容的生存方式的無可避免的決鬥也必要發生，所以，歐洲一定是要聯合戰線，對付蘇聯。近幾月來，這種戰爭

的預測，在蘇聯非常普遍，非常堅強，甚至反而使人十分平淡，以為其來也必，何苦擔憂。不過蘇聯每個公民所要記牢的，乃是：他們必須準備起來的這種責任。共產黨已再三地說明：現在已無法避免戰爭。不過結論雖和從前一樣，但其視線之着重點已經有些不同，他們有了一種新看法。從前的恐懼心理現在已經變做一致為國盡忠的現象；而同時，從前的那種恐慌全然是由於政治上的衝突而起的；現在可又變做由於經濟法則之操縱而生的了。

以上所述的蘇聯戰爭心理，全是實情，毫無捏造。只要把真理報或伊斯凡斯太亞報看牠一個星期的功夫，或再不然，把紅軍的報紙名紅星者稍為瀏覽，便知以上均非言過其實。據云：『在目下到處經濟恐慌和各國與蘇俄的對立形勢之下，歐洲的戰爭種子已經埋下了。兩個互不相容的經濟制度不能共存於歐洲的日光之下。』這乃是蘇聯人民大家同意的一點，無論他是共產黨或不是共產黨。不

過官場方面卻有適爲相反的宣言和談話，這倒也是事實。比方說，就在一九二七年五月間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席上，便有：確認資本主義與共產黨主義儘可和平地共存着，這樣的一個代表蘇聯的表示；經此之後，這種類似的很可讚揚的言詞，迭有所聞。但是蘇聯這種因避免立時的侵略和企圖取得外國信仰而採取的手段，又有誰能不欣賞領會呢？不過在這裏無妨聲明一句，就是：當上那種種出人意表認定這兩個對峙的制度可以共存共榮的表示宣佈出來的時候，世界恐慌的嚴重，還不算露骨，但是最近蘇聯在戰爭心理方面所呈的不安，却不能不說是由於世界恐慌之疾速的加重與擴大。

至於蘇聯對於二次大戰及其近因之確爲如何方式一點，則至今尙懸而未決，端賴日後局勢以爲轉移了。他們相信這一場戰爭將由那國際資本主義之崩潰中的殘餘勢力的聯合行動而起，而同時他們更承認以下的兩點：其一就是：起因可爲

多種可能方式中之任何一種，其二就是：這場戰爭於開始時未必是以蘇聯為目標的。關於蘇聯對方的政治勢力的排列以及在蘇聯心目中，資本主義將以為藉口的因子的分析，我們留待後文詳細討論，此刻我們先把這種武裝衝突之可以預料的幾個主因，試為列舉一下。在波蘭方面的是波蘭對於恢復一七七二年前的疆土的未殺的野心——這乃是受着國內加緊的軍事化和法國方面的助力的支撐而做的一個好夢，加之，爲了像蘇聯當中的烏克蘭人對於其同族（烏克蘭少數民族）在波蘭所受待遇的憤恨，這一類事情，俄波間的關係，益形惡劣。在羅馬尼亞方面的是一九一八年羅馬尼亞的奪取比薩拉比亞問題，按此事羅馬尼亞當時曾得法國之許可，至今法國對此的態度也仍未改變。在法國方面的是法國對於一切足以助長對德之仇視或能與後者打成一片的反蘇政策的自居後援地位，和法國人對於『安全』的瘋狂。如英國保守黨的極端主義，和希特勒氏的種種計劃，尤其餘事。在

東方這一邊，還有至關緊要的潛伏危機二端：一是日本圖在滿洲擴張勢力的志向，與日蘇對於中東鐵路治權再起的競爭；二是英蘇在波斯與阿富汗之利益衝突尙無解決。以上種種還不能代表蘇聯與世界上其他各國間的問題的全部，此外，如關於債務的、充公的，與關於允許不作宣傳的種種蘇歐間的齟齬，還正多看哩。

所以，那些對於這類事情的分析素以認真昭著的共產黨，在歐洲之未來戰爭的確實開端一事，深爲注意，誠不足怪。據他們看來，像波蘭軍國主義之燃眉逼近的威嚇那樣嚴重的事體還多得很，例如國社黨突然有所舉動，希特勒政府在憲法上的正式成立，尤其不消說得，如德國的發生共產革命，這些事情都是促戰爭之爆發的藥引，而且事實上，以上所舉又不過十之一二而已。蘇聯的實際政治雖然不是不知道國際聯盟盟約第十六條在羅加諾所註下的解釋，他們却早已看透上面所舉的那些事端可能的結果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些政治方面的事情實在並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般重要。在蘇聯的政治家看來，歐洲與蘇聯間在政治方面的一切關係，均不成問題的核
心。政治上的問題不過是那不可牽強的經濟法則的外面的象徵，經濟原質的陰
影。共產黨們說，資本主義的歐洲目下或在不久之將來的某一個時期當中，想要
或是不想要和平，那都是無足輕重的。因為歐洲業已到達這樣的一個恐慌階段，
關於戰爭和平一事，牠已喪失選擇之權。現在，戰爭便是經濟國家主義各種力量
的無可避免的出路，牠也便是資本主義制度之崩潰的前幕。而同時這場戰爭必是
對着蘇聯而開的，原因很簡單，即因蘇聯乃世界上與前述制度對立的唯一勢力並
為不與該制度一同崩潰之唯一大國之故。

對於歐洲之經濟狀況如上所述表面上似乎說得過於簡單的這種分析而發生疑
問的外國人，每為下面的一些問題所難：『你不同意嗎？那末請你講講歐洲怎

樣便可以恢復繁榮？你們有什麼解決方法呢？請你說罷：歐洲那一個國家在這個資本主義的支配方法之下，能夠希望有某種可以保證的經濟前途。你對於賠款和戰債的笑話，作何結論呢？你當真以為歐洲的局勢會進步嗎？在一個資本主義構成的社會裏，你有什麼救濟方法可以提出呢？你真想着你們的那些資產階級可以在一晚上的功夫便能學乖，立刻變為腦筋清醒的嗎？或是當全局行將傾覆的時候，那些資本家還是站在那裏不動，袖着手旁觀嗎？或是那些法蘭西人在製造着潛水艇、飛機並且在那裡試用毒瓦斯，都是只為的愛好藝術嗎？你猜那些說我們傾銷，奴隸式的勞働，並且說我們對於我們的債權人有實行欺騙的惡意，還不要提我們對於宗教的摧殘，對於婦女的公有這些毫無道理的話，到底是何用意？你想歐洲看着我們的五年計劃成功，會鼓掌稱慶嗎？『為的以上這些問題不易解答的緣故，所以當一個共產黨和一個外國人談論到下一次戰爭的時候，前者總覺得

自己站在高人一等的地位而帶着特別傲慢的神氣。有一次，一個共產黨員很聰明地對作者說：或者資本主義的最大希望就是組織一個德國國社黨及其他國家主義者與法國携手的同盟，來對付蘇聯。他又說：波蘭當然可以加入牠們。經作者對這個辦法表示了一點懷疑的意思之後，這位共產黨員便爽直地答道：『不是和你開頑笑，你想還是等到你們之間發生紛爭之後才決意聯合起來對付我們嗎？』不過共產黨却讓一步地承認：在開始的時候，這一場戰爭不見得一定是對付蘇聯的戰爭，不過到末尾，總歸是會變成對付蘇聯的。

老實講，現在蘇聯最不歡迎的無過戰爭的發生了。一旦紛爭掀起，蘇聯便須準備犧牲一切，或者不至犧牲一切，也要犧牲十之八九了。此刻他們的力量完全放在五年計劃的實現與社會主義的建築上，但這二者如遇軍事上的大規模的舉動，則勢必整個傾覆，難以倖免。他們當然希望能平平安安地進行他們的工作，

但是在蘇俄，有誰相信歐洲——那就是說，歐洲資本主義——是不在準備着戰爭呢？目下真是沒有一個人能這樣相信的。雖然蘇聯人民也許對於英國或某一國的反戰情感的真誠，並不表示懷疑，可是他們對於存在於這個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當中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平思想』的完全無濟於事，也找不着理由來改變他們的舊有的態度，無論歐洲的一般政治家對於國聯與非戰公約的一些殊惹人喜的理想作着何等天花亂墮的鼓吹與標榜，這所謂『有如水火互不相容的經濟制度』的對立却依然存在。蘇聯的人民經過多年的訓練如今已能做到思想一致的地步，尤其是他們在有關國際方面的問題上的思想一致，格外驚人，這要說是蘇聯宣傳的神效之一了。他們在第二次大戰這個題目上的思想也是集中到同一的結論上來。他們覺得歐洲現在好比在下着一個崎嶇得狠的斜坡，牠的這一而是內部的經濟紛擾，那一而是和社會主義的未來世界的先鋒作死命的掙扎。

二二

蘇聯的戰爭心理，在論理上，到底是否能立得住腳，那是另一問題，不過我們可以說，牠確已結了奇異的果實了。在這些實在的結果當中，有一部分是外國觀察家所無法了解的。假如有人說：現在有兩種事態，這兩種事態合攏來，便可以保證戰事的發生的話，那末我便要說：大概其一便是對於戰爭的恐懼，其二便是對於戰爭的預測了。老實話講，蘇聯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明顯是並非故意的，雖然牠在另一方面，的確領受那些很兇的宣傳關係的指揮，也難否認。不過那幾乎熱量的共產黨竟進而坦白地說道：是不是故意，那是不關緊要的，假如兩方打得性命交關，那時也不問是誰先動手的了。但是有一事總要使我们覺得奇怪：共產黨對於他們自己的那種戰爭心理的一些特別的結果，似乎毫不留意。在共產

黨看來，他們沒有侵略野心，這便够了，對於爲防衛那些畏懼外患之將至的人們——共產黨這樣想——而作的擴大的準備，其影響之如何，他們認爲勿庸負責。事實是這樣：他們簡直完全不知道他們的這種戰爭心理將要變成一些具體的形態，同時他們也簡直完全不知道這種戰爭心理正巧生在蘇聯的意識形態當中，因而得到了非常的滋養。

或許這是因爲蘇聯的整個思想方法還沒有完全脫離『戰時共產主義』的色彩罷。我們並不是說共產黨仍舊把『革命』與武裝的爭鬥相提並論——比方說，和某事開戰，和某人開戰，和一大堆仇人開戰——所以『革命』的嚴重時期依然存在。原來，蘇聯的報章雜誌與政府公告無論在那種活動上都時常採用軍事上的字眼和習語，例如『動員』、『前線』、『陣線』、『戰役』、『克服』、『戰事上的策略』等等，以致一般民衆的腦筋當中，不知不覺地也添上了這些東西。愛

用軍事上的言語，這是很小的事情，算不了什麼，比方，救世軍，就有這樣的習慣。但是我們用得着解釋救世軍乃是一種私人的團體而不是一個國家嗎？我們在此不妨特別着重來說的便是：蘇聯人民已極習慣於關於衝突的那種思想，因此，在國際政治的範疇當中，他們也是無時無刻不在預備運用他們的這種思想。在他們看來，對付蘇聯的戰爭無異與各方的敵對勢力每日的爭鬥的總結算。

還有一件比較重要的事，就是：關於蘇聯報章刊物對於所有其他國家的一般態度。關於國內的時事，莫斯科的報紙都是非常地公正、忠實，而且十二分地理智化；但是關於外國的時事，則不但時常紀載不實，甚且自失尊嚴，濫詞煽動，發惑聽聞。這乃是牠們計劃的政策，不可以偶爾的事端目之。蘇聯那裏是好說話的，至少牠要以怨報怨。蘇聯對於歐洲的時事和人物，可謂盡毀謗之能事，他們的強蠻剛硬和不分皂白，誠非歐洲人所能望其項背，雖然在倫敦巴黎的報紙刊物

上，並非沒有登過「反蘇」的文字，不過無論如何到不了那種程度。當然我們無所用其偏袒，我們對於「反蘇」的文字，也是同樣地不滿。不過，在這裏我們不能忘記這個事實，就是：蘇聯政府對於牠境內的各種報紙刊物以及大大小小一切其他言論機關，均有絕對的統轄權，與在英法的情形，截然不同。其實這種事情，對於國際間的禮節上大有妨害，像這樣的互相攻擊，真是只有把事情越弄越僵。英國的每日工人所最好用的責罵字眼有時也不過是對蘇聯報章的體裁的一兩聲回響而已。關於共產黨爭辯方法的含有挑戰色彩的無禮，我們不必太過認真，不過我們要知道：不管有禮貌也好，沒有禮貌也好，資產階級的尊嚴將不時地受人譏刺，直至無產階級得勝為止。專以英國一國而論，英國當然逃不脫一般對於帝國主義思想及野心的攻擊的範圍。給邱吉爾、勃蘭特福德爵士 (Lord Brentford) 麥唐納氏、張伯倫氏、和鮑爾德溫氏幾位大人物畫的遊戲畫與諷刺畫都及人們

想像中的那樣苛刻，假如去把牠們拿來放在一起閱看，倒是很饒興趣的消遣作品，敢保不會使人發生惡感。就連托洛茨基那次挖苦麥唐納爲「基督教的孟什維克」——給人這樣難堪的頭銜，蘇聯的狂妄無忌恐怕不能再甚了——的名言也並非什麼惡意的，我們與其說牠是出自真心的仇恨的表示，還不如說牠是演說詞中的一種點綴罷了。

但不幸，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實際上，弊害還有。惟可慮者不在蘇聯對於歐洲各國官員的「半侮慢的」與「半惡意的」粗鹵的表示之本身，而在蘇聯之所有報紙刊物對於非共產主義國的一事一物的觀察，已養成一種好鬥的脾氣，傲慢獨斷的態度，和容易引起事端的偏見。蘇聯的報紙刊物既承政府檢查機關的明幫暗助，於是對於歐洲的政治便可任意加工宣傳，以致一般民衆對於外國消息無法分辨，何爲實事，何爲偽造。講到這個檢查機關似乎不能不附帶一句，即牠久已爲全俄

文化最高機關的最有勢力的部門，如今牠收有超越的奇效，手段或許是未免太辣一點——因為共產黨做事講究澈底。不過我們又要重複聲明，就是英國報紙刊物對於蘇聯政治的平均解釋，其同為未能差強人意，也不讓於蘇聯的報紙刊物。至於在真理報與伊斯凡斯太亞報上正正經經的新聞欄內，不時地載有歪曲事實和故意仿效以示諷刺的文字，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必要叫克列姆林來負責呢？

共產黨的政策是比較着重於「揭露」外國的自由思想而不着重於攻擊保守主義的勢力，這倒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共產黨的策略是竄與逃出國外的左派勢力為難，反對牠們，挑動牠們，他們無意空費時間去向那個根本不能調和的右派挑戰。所謂左派勢力是指英國工聯協會法國總工會比利時社會黨等。共產黨之所以採取如上的策略乃是本着以下的兩個目的：（一）在推翻國外社會主義派的「改革式的」態度而同時將下面的事實示諸蘇聯民衆，即除馬克斯社會主義外並無他

種社會主義；（二）在助成左派當中的失意份子的分化作用。哲克斯（J.H.）和巴故的寇仁爵士（Lord Curzon）一樣，當然是他們作爲嘲笑的對象了。不過最可注意的是像俾芬（Mr. Ernest Bevin）這樣的一個勞工領袖也竟爲人加以『蘇聯公認的仇敵』的惡名。在蘇聯的心目中，凡是在漂亮的共產國際的圈外，而對莫斯科表示親善的態度的，就莫不含有資產階級的詭詐與孟什維克的虛偽這二種色彩。假如蘇聯人民對於歐洲的政策能由其他的方法而獲得真相，或至少能以認識整個問題的事實，那末，共產黨對於歐洲政策的新聞的狂妄舉動也不致太關緊要。可惜不能，共產黨是一點都不肯放鬆的。蘇聯還不是十分穩固，革命還沒有完成，故無論宣傳方面，檢查方面，均不容須臾懈怠。這是共產黨的見解，雖然結果是使得蘇聯人民對於歐洲的社會狀況及歐洲人士之情感，完全隔膜，至多也不過是做到一知半解，殊爲可憐。你倘使遇到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而問他

對於英國的經濟狀況作何見解，他必是這樣地答道：「英國嗎？噢，你說不列顛帝國罷！英國當然是靠殖民地的奴隸勞工和強迫其自治領地向其「母國」購買，以自給，但是到明天，或是過兩天，或是一年以後——。」

蘇聯的報紙刊物對於外國事情這樣地解釋，其結果如何，簡單說一句，這就等於給蘇聯的戰爭猜測與推斷，加上一點火油以助其勢。在烏拉爾地方的鑛工，在烏克蘭的農民，以及各新工業中心的工廠工人都受了這種宣傳的影響，以為：他們不但依舊是處於舉目無親的蠻夷境域，而且各國的槍口都對着他們，他們以為：無論在巴黎、洛桑在倫敦在海牙在日內瓦，任何的一個聚議都是反蘇的陰謀詭計，而英國工聯協會也正和邱吉爾一樣，同為可憎的仇敵。說到這裏，我們聯想到莫斯科大批技師被控的有名案件的幾次審理，他們的罪名是破壞五年計劃與協助反革命活動。譬如就拿我們英國人來說，該案與我們究竟有何關係，我們何

嘗有什麼興趣？在這些令人注意的罪名與同樣足以令人注意的供認背後其真相究竟如何，關於這個問題，蘇聯人民心裏已經十分地明白。人家告訴他——屢次地——說這一班『破壞者』乃是拿了外國政府的錢，受外國政府的指使，從事於大規模的外國干涉之初步工作的。當時各報紙各刊物無不連篇累幅地爲這件事情宣傳，以致全國風起雲湧民氣激昂，而反對英法政府的表示也到處都是了。據說這些激昂的示威都是『應運而生』的——這或許是對的——不過這樣說法適足以加重此種宣傳對於民衆方面的效力。可是我們知道：對於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府的懷恨並不能引起對於一般被壓迫的無產階級的同情；如今這種『全世界的工友們呀，團結起來罷！』的呼聲仍舊是共產主義的口號。但是去打仗的不是政府，至於布爾塞維克對於歐洲各國政府的力量與歐洲民主的力量區分，於緊急期間，當不能像在平時的明顯。譬如說罷，現在求印度問題之解決的僅是英國政府而不

關英國人民的事嗎（不知『人民』是否等於『普羅列塔利亞特』）？月來蘇聯的報紙刊物對於英國的印度政策與最近提出的種種辦法，其論調均屬不偏不倚尖銳苛刻的譏諷。在某種限度內，我們是應該承認的，那就是：到今日我們要為帝國主義的執照和過去的敗壞而償付。但是因為想煽起反帝國主義思想的火焰而捏造許多奇離古怪的故事，說什麼緬甸人因英國極度剝削的結果以致無力納稅因此而遭槍決者每週數千人，這是需要的嗎？我們有點懷疑。

截至今日為止，外國人一心在希望那班言論界的名流可以主持一點公道，說幾句頭腦比較清楚的話，誰知事實上大大不然，這班名流的論調反而變本加厲，暴躁不堪，這真是蘇聯出版界當中的一個怪現象了。最近連賴迪克也屈服於流行中的輕率主義。高爾基尤其好，他鬧得更兇。在過去的一兩年，某一個期間當中，他曾自居於布爾塞維克與歐洲社會主義思想的中間人地位，關於西歐和西歐

的文化，他曾爲極其暴烈的表示，而對於蘇聯的文化却又誇獎備至，使人不禁驚訝。如此強暴的表示，出自一個唯心的而且十分溫和的人物的口中，我們只可以舉很爲平常的人類心理之驟變來解釋了，不過高爾基在青年界的勢力比隨便那個現代作家的力量都大，這一點，我們不能忽視。去年八月間，高爾基寫了一封很長的『公開信』給『歐洲的智識份子』，全文從頭到尾處處顯出一種就像宗教熱忱的國家觀念的自足，還有，資本主義社會在美術方面的成就也同時被他攻擊得體無完膚，一文不值，在收尾，他發出怪異的恐嚇如獅之吼如虎之號，令人聞之不禁胆寒。這篇文章在結構方面，實在太過散漫，至於說體裁也太欠雅。在一個外國人看來：像高爾基近來這樣的提倡蘇維埃國家主義，和在蘇聯各工廠，各辦事機關，各公共場所到處可見的紅軍首領伏羅希洛夫的許多通告，都是足以妨害蘇聯對於和平渴望之實現的。伏羅希洛夫的幾個最顯露的通告當中，有一個便是

向歐洲下警告的。（作者初次看見是在去夏，在莫斯科的那個名爲外國文化溝通會的等候室內）。據說蘇俄並不想打，不過倘使外界的威迫，使牠非打不可，那末，『一個計有一萬萬五千萬自由民的國家就得前去應戰，因爲是，非去應戰不可的。』

四

以上所論戰爭心理的種種象徵，本全由於恐懼而來。除非祇看歷史事實的表而不用說，否則任憑誰都不會否認這句話的真實性。假定歐洲與蘇聯間的一場惡戰是真的不可避免，那末蘇聯目下的防禦準備工作，是決不能誣爲罪惡的。但是我們要曉得的是：這一場戰爭是不是一定不可避免呢？我們更要曉得的是：蘇聯已準備好了嗎？或者是：他們準備到什麼程度了呢？

若由另一方面看，則蘇聯對於戰爭威嚇之反應似乎不算大不了的「事情」。本來像這樣的事情在歐洲各國隨處可以發現，有什麼稀奇呢？而且，在今日十分軍事化的歐洲局面之下，像蘇聯的這種反應，應該也不算怎麼十分失常。單就這些反應的本身來說，牠們在弊害上比隨時有挑起戰爭之可能的波蘭的領土慾，還勝一籌；牠們比法國的力圖安全保障，也要好些。雖然如此，我們如果把牠們當做不關緊要或比較不關重要的事情來看待，那可就錯了。這些對於戰爭恐懼的反應不能以小事目之，一則是因為這是發生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其對外政策多少年來一直是被一種遲早勢必為人襲擊的觀念所壟斷的。二則是因為這是發生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其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隔離有如蘇俄者。也確實是爲了這種特殊的隔離，才會使蘇聯對於戰爭的猜測有這樣十分嚴厲而且失乎常態的情形。我們以爲：在政治哲學方面只要有多一點的謙遜，在主義的觀點上只要稍微放鬆一點。

對於走入迷途的歐洲，只要稍微虛心一點去求諒解，那末，就雖然未見得能夠影響或改變共產黨對於將來資本主義的結局的分析，也可以在避免決鬥的一端上，貢獻相當的力量了。

講到這裏，我們似有一考蘇聯之軍力的必要。就把大概的事實呈露出來是不用多少話的。一般的觀點來講，蘇聯不算是列強之一。在內戰終了的時候，工農混合的紅軍數目在四百萬人以上。但在一九二四年以後，常備軍的數目僅爲五十六萬二千人，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保持着這個不變的數目。像這樣的一個數目，以蘇聯之疆土的遼闊和牠的邊防的衆多而論，實在不能說是特別大的數目。紅軍在軍備方面雖遠不及西歐諸國的軍隊，但是牠却不愧爲訓練優良紀律嚴整的一枝軍力。蘇聯的海軍從戰爭方面着眼，是簡直無足輕重的，不過蘇聯的空軍却非常有力，雖然在量的方面未免小一點。軍用的機械，概括地講，也沒有歐洲的來得

精良和齊全。至於運輸的不靈則尤爲戰時的大難題。照普通說，隨便幫着那一個列強去打蘇聯都是很安全妥當的。

但是我們還有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要知道：如今蘇聯雖在實行全國準備，可是牠可以說毫無侵略人家的念頭，所以就自衛方面來講，牠所有的軍力是不至於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微薄的。紅軍乃是實行徵兵制的。雖然常備軍的數目連官佐在內也不過五十六萬二千人，可是在這常備軍之外，由普通百姓當中，每年總要抽出八十萬人來給以軍事訓練，其訓練期間爲二年。在晚近的幾年，尤其是最近的幾月以來，這種軍事訓練大有一日比一日加緊的趨勢。這還不止。蘇聯的各種訓練，也同時包含馬克斯主義的訓練。軍事訓練不是例外，況且不但不是例外，牠正是這句話的再好沒有的實證。對於紅軍士兵的政治教育，政府格外地留意，因爲一方面要使他們真能打，另一方面還要使他們具有革命的思想。第一步

的訓練便是讓他們澈底了解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他們當前的目標的正大。他們又要知道應當怎樣信仰無產階級的忠誠的觀念。他們聽到資本主義文化的種種醜態。所以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在軍事訓練這一方面天然地得到十足的效果。結果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凡有紅軍參加的戰爭，無論是什麼戰爭，都必定是一場神聖的戰爭。

此外，還有一件頗為重要的事情，我們應該略為說說。就是在各種愛國團體的活動當中，也可以發現對於蘇聯之軍事防衛計劃的非官方面有力的援助。在這些團體當中，聲望最大的當推名為歐蘇維與（Osoaviakhim）的一個（牠乃是以下三團體的聯合體：一、防衛協會，二、航空與化學研究會，三、飛機協進會）在一九三一年年底，牠已有會員五百萬人以上。其目的為促進一般人民對於航空學與軍用化學的知識。凡在蘇聯有相當地位的科學家，都是牠的會員。在蘇聯各

處，無論是在工廠，是在農莊，牠都設有分會，此外，牠還另外組織許多研究班，籌備許多關於軍事問題的講演，組織男女會員練習放槍會，和表演防瓦斯面罩的應用等。其實，土地之集合化和對於頑抗敵意的「富農」的監視，都不是紅軍的力量，而是上述的一個團體的功勞。至於近幾年來，這個團體的經費數目以及蘇聯政府所予牠的津貼若干，則無處可查。此外聲望卓卓而同樣以協助軍事爲任務的組織，還有莫浦爾（MOPR）（意譯則爲國際革命後援會），牠有會員五百萬人強，與上文所說的歐蘇維興相彷彿。牠在工作上除其名稱所指示者外，尙有其他活動，宣傳軍事防衛便是後述的活動之一。最後，我們尙須補充的是：我們只要論及蘇聯之防衛力，便須提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軍事化一事而予重要的地位；這個機關乃是列寧主義的堡壘，而同時在許多方面，牠也是今日蘇聯的熱誠的支柱。

五

根據以上的事實而謂蘇聯切盼戰爭之來臨，或謂蘇聯現在準備軍事之侵略，那真是無稽之談，不值識者一笑。蘇聯沒有自殺的意思。在共產黨的心目中，向歐洲挑戰是有失尊嚴的事情，光是這一點，已足制止他們當中最剛狂的份子而有所餘。此刻我們不如將他們自己的談話抄出一段，藉以窺其真實態度。『我們不希望戰爭，』他們肯定地說，『我們決意力圖避免。可是我們已經準備戰爭之到來。其實無論歐洲是否主張和平，無論歐洲各國有意和我們確立邦交沒有，這都不關緊要，戰爭總歸是不能避免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不能少了這一步。牠的命運已經確定了。但是牠的維護者，將要因了那個必起而代之的制度——即今日已存在蘇聯當中的社會主義關係的制度——的向前威迫而作最後的掙

扎，以圖自存。從世界資本主義至世界社會主義可以由和平的演進而到達，那是全屬「烏托邦」的妄想。馬克斯曾這樣宣言過。」

現在共產黨把戰爭的基本原因祇看到經濟危機爲止便已深覺滿足。但是我們在西歐的人則不能這樣容易滿足而封步自守。資本主義的機械的一大部份的崩潰恐怕要算是我們最難忽略的一件事，況且和平與戰爭的問題還包括其他的條件。總之，戰爭的一個原因與實地的開火是截然不同的。這一點不同正是共產黨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所遺漏的東西。這一點不同還許可以給予歐洲最後的希望。

三 蘇聯與歐洲各國的衝突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一年

一

起初布爾塞維克們深信：俄國革命的完成須有世界革命爲其前提。他們以爲：假如世界革命得不到手，他們自己的生存也要以革命在歐洲其他部分能夠成功爲第一個條件。當時他們沒有看到共產主義可以在單獨一個國家實行的，因爲按照馬克斯氏的推算，這是萬萬不能的。所以，他們希望到處都發生革命，他們鼓勵革命，他們隨時隨地願予革命以援助。列寧曾經說過：「目的是把一場帝國

主義戰爭改爲一場內戰。』他們的結論是：在俄國所成就的也必是在各交戰國中醞釀着，不久就要成熟。但是不巧當革命駕臨到德意志與匈牙利時，竟遭了夭折。所以布爾塞維克們在歐洲非常孤寂，況且左而是外國干涉，右而又有內戰。於是他們對於國際無產階級大勝利的希望，便逐漸像風吹雲散地消滅了。

誠然，共產國際是一件事，蘇聯政府是另一事。一方面共產國際的宣傳依然前進沒有停止，而他方面蘇聯却已感覺：有與資本主義的歐洲成立某種妥協的必要了。布爾塞維克們改變了方向，他們再不到西方去尋找革命的徵示，他們把眼光轉到東方來看。在阿富汗、波斯、和中國，他們尋到適合他們的政治哲學的環境了。布爾塞維克的思想於是遂散佈到這幾個國家裏來，不過這幾個國家都是公敵英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好在由雙方的協約與友善的表示，他們還有把主義推廣開來的可能。回過來再說西方，西方的對布爾塞維克主義實行經濟封鎖和法

國的樹立『防疫連營』(Gordon sanitaire) 政策，以防赤色主義之侵入，都是使他們十分憂鬱的，他們後來採取了『新經濟政策』，也即因此。在歐洲方面，他們此時所能抱的最大希望便是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對他們表示同情，但彼處的革命起事，則簡直還不及曇花一現地都被資產階級的政府給完全彈壓下去了。此時蘇聯自己在社會主義的建設方面也顯然有停止一下的必要。『革命』的戰術家主張布爾塞維克的策略不能永久不改，他主張視環境如何而定策略，所以當時決定下來的是；前防撤退，和一時再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當然列寧是取的退却的方法，不過這不是此一退而再不復進的意思，他是打算待日後較有把握時再行進攻的。歐洲却被他欺騙了，歐洲當真以為：共產主義的理論已在溶化着而布爾塞維克與『文化的勢力』的和解也近在眉睫了。慢慢地蘇聯便與歐洲恢復通商；其中包含通商條約、政治協定以及關於宣傳的協約的簽定，雖然各國對於蘇聯政府

並未予以外交上正式的承認。沙皇政府舊債的償還要求恰巧和因外國干涉所受損失的賠償要求兩相對立。關於討論蘇聯政府從前所沒收去的外國財產和外國讓得之利權的談判開始了，但是忽而拖延下去，忽而中斷，忽而決裂，忽而重開；關於新利權讓與的協商也曾開過談判。蘇俄的工業與其在經濟上的相當穩定也逐漸恢復起來。世界其他各國這才恍然大悟：布爾塞維克們雖然採取了『新經濟政策』，可是牠對於社會主義之社會的創造，其熱忱則一如往昔絲毫無減。當史達林與托洛茨基二人爭奪黨權的時候，後者的辯詞是：『國家共產主義』不但是要不得，而且是走不通，牠乃是背叛馬克斯與列寧的。不過結果『國家共產主義』得到了勝利。在這幾年當中，蘇聯努力於內部的整頓和國基的鞏固，而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也依然從事於牠自己的任務。共產黨對於以下幾點，依然保持其固有的信仰，即一、他們的最後目的便是建設一個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秩序；二、這

個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秩序乃是不可避免的（照馬克斯的哲學來講，牠乃是無論如何勢在必達的境域）；三、不經過世界革命，上述的這個社會主義秩序就不能完成。但在眼前尤其是在中國革命的慘劇演過之後共產國際的向外活動暫且退到蘇聯的幕後來。布爾塞維克對於像國際聯盟這樣的機關，當然祇有藐視而已，但是當某個時機到來的時候，他們的舉動却又出人意料之外，他們非常敏捷地在非戰公約上簽了字，這樣敏捷的舉動尤非各列強所能夢想得到的，而且起先牠們存意要把莫斯科給撇開一邊。沒想到最後還是聽從了德意志的勸言，蘇聯政府未被允許至巴黎參加盛典，但牠在該約發生效力幾個月以前便已老早予以批准，說起來，牠還算是第一個國家予以批准的。至一九二八年十月，蘇聯採取了五年計劃，全國眼目遂集中於實業化一方面。故在蘇聯領土以內，舉凡一切有關信仰的事情或有關政策的主張，假使牠是妨害實業化之進展，或有此種妨害之虞者，均

爲與共產黨的正路背道而馳的舉動，要受立時的處罰的。這五年計劃往前進展，牠的進展與世界經濟恐慌的進展正好並駕齊驅。

我們現在並不是要把蘇聯自從革命以來與各國所發生之關係的全部歷史，從頭至尾，給溫習一過。我們的目的祇在舉出將於最近的未來足以促成戰禍的那些蘇聯與歐洲之間的衝突，並爲之闡明而已。簡單地講，有若干爲這部衝突史所引起的事端乃是共產黨認爲資本主義國將以爲戰事之主要口實的。

總之，如果說布爾塞維克對於世界革命的希望已有暫爲擱置的形勢，那祇是因爲他們已然相信這件事，就是：那個先於國際無產階級大勝利的國際軍事決鬥業已迫在眉睫了。那就是說：下一次的大戰天然自己會達到共產主義的目的。按照馬克斯的論理來講，目下所有關於債務、賠款、關稅以及金價和失業等問題的瘋狂，祇有一個治療方法，那就是經過更厲害的瘋狂。全局關鍵所在可分以下兩

而：（一）在政治上與財政上法國在歐洲所居之領袖地位；（二）英帝國主義勢力的日形消滅。

一一

法國今日執歐洲之牛耳，乃顯而易見的事實。牠的尊高建立在一種能夠永久一貫的政策之基礎之上，這個政策乃是屬於現實的，屬於論理的並且絲毫不受博愛主義的傳染的。當我們講到法國自和議以來之政治與經濟的目標的時候，也許沒有引出如『惡毒的動機』『歇洛克主義』（註1）(Shylockism)『極度的貪婪主義』等等辭句的必要能。這就是瘋狂的所在，況且，抑有甚者，除德國不計外，英國受害於法國之對外政策的關係，較之任何其他國家為甚，所以如今英國人對於法國的懷恨，雖然是也不無純粹心理方面的因素，但一大半還不能不說是

他們對於法國所特別恩賜他們的種種不利的反映。不過我們務必認清：法國目下所行的政策的充滿自私、強性的貪望、和報仇心，本由於最凶惡的「經濟國家主義」而來。經濟國家主義，誠然是最凶惡的，但是我們能歸責牠嗎？倘使各國，尤其是英國，在幾年前便留意到經濟國家主義的氣焰之鋪展而預為制止，而同時敏捷地促成一種國際經濟合作的政策，那末如今法國在歐洲也可不致太過揚眉吐氣唯我獨尊罷。

事實上，法國便這樣地保持其領袖地位。如果我們不把法國對於蘇聯之態度的前前後後先為紀述，則法國取得領袖地位在過去過程中的影響以及其於將來的關係，也都不易明瞭。法國對於蘇聯所取態度的一部歷史含有如次的幾點意義：

- (一) 牠是法國在軍事方面稱雄的一個線索。
- (二) 查法國目下最深為憂慮的無過蘇聯與德意志的公開成立一種同盟，所以法國對德的手段日見毒辣了。
- (三)

波蘭的野心，波蘭的覬覦蘇聯領土，和歐洲對蘇聯之進攻大有可能由波蘭帶頭掀起的情形，以上均為法國對蘇聯的態度所操縱。(四)法國對蘇聯的態度更左右其諸鄰國對蘇聯的態度，在諸鄰國當中，又以羅馬尼亞與捷克二國格外惟法國之馬首是瞻。(五)截至現在為止，法國對蘇聯的態度乃是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勢力之一般反應的決定條件。

法國之所以參加干涉蘇俄內政，其動機甚為明顯，雖然法國實際上所走之路線複雜不堪，而且在相當的範圍之內，這些路線又為一種法國所獨有的論理所蒙蔽。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一般畏懼，及協約各國看見布爾塞維克予德意志以軍事上的援助而相顧倉惶失措，這祇是一般的情形。要是說到法國則此外更有商業上的與財政上的種種問題，這些商業上的與財政上的問題實在很關緊要，倘若拿牠們和首倡干涉蘇聯的英國在同一方面所要顧慮到的幾點比較，則前者的重要遠

過後者多矣。

沙皇政府積欠法國的債款爲數至鉅，這就是頭一件事。在一九一四年前的幾年當中，法國借給俄國的款項已達奇大的數字，迄大戰時，當然不會稍減。俄國的農民當時飽受苛捐雜稅的剝削，窮苦萬分極形憔悴。一半也是爲了担負這些法國借款的利息的付給。但是關於借款的用途，則沙皇政府自有道理，豈容人民過問，牠是專以鉅額的金錢用在絲毫不會生產的事情上去的。在另一方面，則爲法國的以歐洲之放印子錢者自居，由放債以圖重利，全然沒有好意。可是若由法國政治的觀點來說，則比較借款（本來債券持有人多爲法國富農）更有急切關係的厥爲法國在俄國工業上的現金投資（自從日俄戰爭之後，俄國的工業落後漸爲幾個歐洲國家所乘而加利用，她本國資本家大都以紡織業爲對象，而外國資本家則以重工業爲對象）。法國在俄國工業上的投資總額，據蘇聯經濟學家的計算，

僅七萬萬盧布有奇，如果我們拿牠和俄國的法國借款之總額比較，則相形之下，前者自覺失色。法國的投資爲數雖還不如其借款的數目大，但是牠這些投資大都集中在烏克蘭與毗鄰的頓涅斯流域（Donetz basin）則歐俄最富庶的所在。法國爲保護她本國人的利益計，才斷然採取了對俄干涉政策。克里蒙梭雖一面深以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侵入其他列國——比方說向匈牙利罷——就算不提波蘭——爲慮，但一面仍然不能將法國資本的神聖權利給忘懷。其實要使俄國有償債的能力，仍須視俄國能否從容開發烏克蘭的鑛產和舉辦烏克蘭的重工業。可是克里蒙梭忽視了這一點，他以爲無論如何犧牲也要保全法國在烏克蘭的財產，他以爲這是法國當今之急務。此後法國與蘇聯間的關係和法國爲蘇俄之鄰國的後盾的一部歷史全以法國資本家於大戰前在烏克蘭與頓涅斯流域所取得的地位爲焦點。

假如是希望沙皇政府的借債，能夠償還，那末在俄國出現一個有力的政府應

該也是恰合人意的。但是法國的債券持有人又豈敢對於布爾塞維克政府希望點什麼呢？但是直至布爾塞維克們在布列斯特·列塔夫斯克與德國簽訂和約之後，法國才表白其態度。當德國到底能由那些渴望和平已久，期望得暇即可致力於革命之維護的布爾塞維克領袖的手中，勒索多少利權還沒有顯示出來以前，法國是猶豫不定，不知何所適從。可是布列斯特·列塔夫斯克已把整個問題乾乾淨淨地結束了。由法國的觀點來看，法國必須與東歐的一國或數國締結同盟才行，不過她的意想中的同盟國必須具有以下的兩個條件：其一就是自願共同抗德；其二就是協助法國在烏克蘭的計策。波蘭恰巧是具備上述條件的一個國家，其次則有羅馬尼亞和捷克。於是遂有『防疫連營』的成立，這一枝軍隊含有以下的作用：預防西歐為布爾塞維克主義所染；恐嚇蘇俄，并且倘若需要的話，將蘇俄瓜分；監視德國的一舉一動，並且時時刻刻看住法國的利益。在波蘭呢，她乃是期待着好運

的。波蘭人大都懷着恢復舊觀的幻想，在他們的想像中，他們看見自己擁有偌大的帝國：一面是波羅的海，另一面則爲黑海。波蘭覺得站在法國庇蔭之下受其照顧乃是一件聰明的事情，法國覺得收留波蘭以爲自己的羽翼也是合理的行爲。波蘭對於烏克蘭，固有攫爲已有的慾望，但是法國對於這件事却並不畏懼，因爲法國深知她在烏克蘭的財產不致因此而橫遭損害，法國深信以政治上的主權讓給波蘭已是綽綽有餘了。這樣，波蘭一方面受着力不下人的法國的鼓舞和軍事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幫助，就直向抗俄抗德的目標奔來，這樣她就變成法國在東歐的政策的監護人了。所以，簡單地說，法波的同盟乃是法國在歐洲政治握得霸權的第一步。

法國所給予俄人倒共運動的實際幫助，計算起來，實在有限得很，雖然予蘭基爾那一回的援助要算例外了。科爾却克但尼金和尤典尼其都沒有意思將俄國國

十讓與波蘭或其他的國家，所以若就這一點看來，他們還不失爲俄國的愛國份子。若照邱吉爾的話來講，則予這班反抗勢力最大援助的還得首推英國。法國的策略則迥然不同，她以爲這樣做法太不值得，她寧願倚賴那些隣國，她原來已經看透列國的各懷鬼胎和只圖己利。遠在一九一八年，即有一件指示法國嗣後當走的路線的事情突然發生。在那時，布爾塞維克們正被內外各種問題所纏，忙得可以，於是就予羅馬尼亞進佔比薩拉比亞而爲已有的絕好機會。起初只得有法國的核准。在凡爾賽，並沒有確認其爲羅馬尼亞所有的決議，不過後來法國會擬定承認這回的奪取爲合法的草約一件，並且除日本一國外，各列強均於一九二〇年的十月在這個草約上面簽了字。但是日本直至如今還沒有予以認可，其中底細固難斷定，不過也許這事和蘇聯讓與日本的許多權利不無少許關係罷。

比薩拉比亞的問題，真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蘇聯雖無將以武力奪回的表

示，可是她決不肯就這樣喪失了牠——在蘇聯的地圖上，比薩拉比亞依然包括在蘇聯版圖之內。在一方面，羅馬尼亞對於比薩拉比亞的佔據，不缺少歷史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理由，在另一方面，蘇聯對於牠的收復，又何嘗不是一樣地振振有辭。到底誰是誰非真是不易分辨，不過若從國際公法上立論，則羅馬尼亞刻下的佔據原是不生效方的。這便是蘇聯與歐洲間之衝突的危機之一。

三

剛才所說的比薩拉比亞問題，乃是最重要的問題當中之一。固然目下歐洲和蘇聯的關係，其指針在法波二國的態度。比薩拉比亞問題——即所謂得尼普河(Dnieper)的亞爾薩斯·羅蘭——在某幾方面，只是次要的問題，牠可以用很和平的方法來解決的，可是現在蘇聯與法國為訂立一個不相侵犯條約而開的談判的

中止，却明顯地是因爲這個比薩拉比亞問題的從中作梗。第一個是法國堅持着：法國與蘇聯訂立一種協定須以蘇聯與波蘭間也簽訂同樣的一種協定爲先決條件，而輪到波蘭，牠又堅持着：牠與蘇聯成立一種協定，須以蘇聯與羅馬尼亞間也簽訂一種協定爲先決條件，這樣一來，不啻大家逼着蘇聯承認羅馬尼亞的攫取比薩拉比亞爲合法。這樣強人所難的事情恐怕蘇聯不能答應罷，不過法波二國也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的。難道是因爲法國實在有訂約的誠意而蘇聯才再三再四地向她提議嗎？據說法國就等着在蘇聯的照會中，發現『侵略者』的定義。侵略者是什麼？這是很饒興趣的一個問題。也許波蘭能夠解答罷。

四

比方說，不宣而戰地派兵入人家的領土並且佔據人家的國都，這是不是侵略

者的行爲呢？一九二〇年四月皮爾蘇斯基的勝利就是這樣幹出來的，他已得有法國的許可。這是當然。波蘭遣軍直入烏克蘭境域，進擾基輔。波蘇的戰爭就此開始了。

在休戰之後，突然遣兵奪取立陶宛的維爾那——當然還是得有法國之許可的，不過有一樣，這乃是違背那時常被入違背價的國聯的舉動——這是不是侵略者的行爲呢？可是這就是波蘭幹的事情，時在一九二〇年十月，發生在她和蘇聯正在從事和議之初步談判的時候。

蘇聯與波蘭之衝突，捲入歐洲之複雜外交關係的漩渦當中而成爲其中之一，互相牽連着。波蘭對蘇聯的敵意與蘇聯對波蘭的仇視原本是很悠長的歷史的，迄布爾塞維克革命之後，則曾經有過一度的轉變。經此之後，華沙與莫斯科的關係背後，便多出一個法國，如今，在她們的關係當中，法國真是居於首要的地

位，雖然我們在論及波蘭對於蘇聯的態度時，也不可把那些心理方面的因素給撇在一邊，不加留意。即以波蘭的獨裁者的個人品性，及其習慣、思想，以及理論方法與生平等而論，沒有一樣不是十分反俄羅斯化的。國家主義與宗教情感在波蘭高居着寶位，可是在蘇聯，則又適得其反，蘇聯乃力主世界大同剷除宗教組織的新集團。素爲沙皇治下之俄羅斯特徵的那些封建式之社會組織，大體依然存於今日的波蘭。所以爲本能的驅使，這個『陳舊的』新波蘭和那個『簇新的』新蘇聯，根本不能相容。如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所發生的蘇聯駐華沙大使佛科夫（Voikov）的被刺，這樣的穿插，益使對立的局面分外嚴重。波蘭對於諸隣國的反革命勢力多方地予以鼓勵，而蘇聯則對於波蘭的少數民族的要求，也多方地予以鼓勵。

在波蘭的少數民族當中，最大的就是烏克蘭。據一九二一年的統計，牠有人

口四百萬，而波蘭則共有人口二千七百五十萬。波蘭對於這些烏克蘭人素採高壓政策，而在波蘭治下的烏克蘭農民也對於波蘭不勝憎惡，情形無異往昔。在莫斯科與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方面，則無時無刻不在期望這一部分的少數民族，歸於蘇聯之內。這是危機之二。

幾乎同樣重要的是波蘭的佔據維爾那。維爾那是立陶宛文化的舊中心。立陶宛的失去維爾那就如好好地被人割下一塊肉，不勝悲憤。原來立陶宛是歐洲各國和蘇聯簽訂條約的第二個國家（第一個要數愛沙尼亞）；按照條約的規定，蘇聯承認立陶宛的主權及於維爾那和科夫諾（Kovno），而對於前者的承認，則更因後此蘇聯之一再否認波蘭之佔據其地為合法而證實。這是危機之三。

目下波蘭的經濟不景氣大半是由於她與蘇聯在貿易上的重重限制，而她與德國間激烈的關稅戰爭，則為另一原因。在過去，像前述的這種不景氣已經引起過

真不止一次的戰爭了。

不過所有存於蘇聯與波蘭間的具體的危機及此種危機之因素，都是由波蘭這一方面做成的。牠們不過是波蘭之雄圖遠略的表徵而已。波蘭不時地作着恢復一七七二年的版圖的迷夢，這乃是盡人皆知的。自從凡爾賽條約之後，她未曾一日放棄她那種擴大地盤的念頭，這也是世所共見的。可惜皮爾蘇斯基企圖將許多國家，如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等給拉攏在一起，使其居於波蘭指揮之下的大計，實行所謂『東歐封建主義』也者，竟無絲毫的結果，而連綿不斷，遷延已久，意在組織反蘇聯的波羅的海各國集團——波蘭、芬蘭、拉多維亞、愛沙尼亞四國均在內，過後羅馬尼亞大概也要加入——的那些談判，又好比曇花一現地完畢了。波蘭的熱望雖不無今昔之感，但以法國的援助依然不會稍懈，若謂其已經完全消失，則猶不可。

法國的突然佔據魯爾好像是叫波蘭見機而動的暗示。但是蘇聯對於法國這種舉動的憤慨與再三的抗議，和她所表示的對於理想中，波蘭侵略的抗抵的決心，都是波蘭所未曾料及的。一九二三年一月，紅軍開拔到波蘭的邊境，而且在那裏演操，預先防備波蘭對德作戰時其大隊人馬會鋪展到蘇聯領域來。在蘇聯方面，固然自知此舉乃屬冒險行爲，而在波蘭方面，則因蘇聯態度的堅定而深覺還是等打死老虎的便宜。況且歐洲各國對於法國的魯爾政策大都不滿。波蘭當然無意與歐洲反抗或是與蘇俄攜手合作的。

在後此的幾年當中，蘇俄和波蘭恢復了通商；而且在皮爾蘇斯基不掌全國大權的一個期間當中，蘇聯與波蘭間的關係，頗可樂觀，雖然一時或者不能一脚邁到友善的地步。可是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在皮爾蘇斯基大將領導之下，政變突然發生，自此之後，他又回復到原來的地位，而因此之故，波蘭與蘇聯漸趨妥協的

形勢，立時改變。其實，波蘭對蘇聯的態度根本是敵對的，也許公開的表現出來，也許一時的隱藏不露；但其為根本敵對則一，而同時在資本主義崩潰程序中，兩國間實在衝突的爆發，也不會距今太遠的。

若由大處看，由波蘭之為歐洲和平的威脅方面來看，則實在的危機如維爾那問題者，均不足引為大慮。最淺白的事實是：波蘭的一般目標乃是既不為歐洲的和平所容，又不能同她與蘇聯間的和平並行不悖，雖然她的這些目標，若非得有法國在軍事上與財政上所給與她的援助，則全然等於夢想，她和法國乃是歐洲最窮兵黷武的國家。她目下所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壓迫雖較其諸隣國所受者為尤重，但在前此的許多年度當中，她在軍備方面的開支總要佔其全國預算數目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有時，則竟為百分之四十五（倘若數年經過一番嚴格審查）。

所以，當非戰公約以前，蘇聯在企圖與波蘭締訂一種『廢止戰爭』的條約上

的努力，全是白費，這是不足異的。再者，在現下經濟擾亂的場合之下，波蘭在附加於前述公約的李維諾夫草約上簽字，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五

法國與波蘭的同盟，可以視為歐洲對蘇聯之侵略政策的關鍵。就某幾方面來講，英國與蘇聯在東方之利益衝突，是不大要緊的，不過英蘇的衝突却含有一種根本的意義在。英國與蘇聯之間雖有不少嫌隙，例如債款協約的議而不成，英國報紙對於西伯利亞牛油之傾銷，及在俄國北部森林區域的囚犯勞工等事的好作情皮語調的反對，蘇聯政府與英國享有專利者的競爭歐洲煤油市場等等，不一而足，不過若就這些嫌隙的本身而論，則實與目下各國間一般的經濟糾紛，相差無幾，不值我們特別注意。但是我們要知道：英國與蘇聯的對峙，在表面上雖然不

顯，可是在事實上，則頗爲嚴重。在一方面，共產黨認爲：社會主義大同世界最具體的現在對立物不是別的，就是大英帝國，在另一方面，英國人不但憎惡歐洲的共產主義，而且對於共產主義在東方的傳播，也深爲關切。其實後者才真是目下的重要問題，前者不過是皮面上的事情。英國對於蘇聯的態度，必爲一個帝國主義國對待反帝國主義勢力的形式，非常明顯。這不止是一種有關帝國情感的事情，這乃是有關英國商業，英國繁榮，以及英國整個經濟生活的大問題。倘使英國要保護其在印度、波斯、阿富汗、埃及、中國，與非洲等處的既得利益和市場，則英國的權威與蘇聯的勢力，便不能不處處抵觸。在帝國主義與蘇聯兩種對立制度之間，根本沒有方法調停。英國人的觀點是很簡單的：『在現下的世界經濟狀況之下，』英國人鄭重地說道，『我們不能讓布爾塞維克思想或其宣傳，破壞我們在亞洲中部的商業利益，損害我們的對外貿易，使該處的失業人口增多，

并且使我們的政治恐慌、經濟恐慌越發加重。我們必得打倒東方的布爾塞維主義。『蘇聯——至少共產國際的——觀點是純粹馬克斯式的。他們說道：『英國是大同主義的大敵，她是壓迫殖民地與經濟剝削的模範勢力。國際共產主義的勝利當在大英帝國主義消滅之後。』

這兩種觀點的大相逕庭，既如此其甚，至於結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共產黨難得說『英國』怎樣怎樣，或者是『英國政策』怎樣怎樣，他們喜歡用『大英帝國』，『大英帝國主義』這一類的字眼。在他們的心目中，所有爲英國操縱着的國際政策，沒有一個不是暗中爲帝國主義的緣由所指揮着的。他們對於英國史當中種種問題顯示的苛刻，原來全都是因爲英國在他們心目中，乃『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剝削的表證。誠如寇仁爵士所言，共產黨領袖乃是研究英國遠東政策的學生。他們有時看錯了這種政策，倒不要緊，只是他們一口認定

這種政策乃是英國已往、現在及未來政府方面的傳統政策，那可真討人厭。共產黨領袖尚且如此武斷，她的其他黨員更可想而知，因為在後者當中，其對於大英帝國之知識，大都限於『自治區』(Dominion)、『附屬地』(Dependency)與『皇冠殖民地』(Crown Colony)幾個名詞在法律上的區別，此外具有稍微深切認識的，恐怕簡直就如鳳毛麟角了。實在，大多數的共產黨都犯着一種毛病，他們好先有成見地探尋帝國主義的後台老板是誰。他們在談論大英帝國的命運時，常常喜不自勝，這實在是也很奇怪的。英國工業的繼續崩潰，大半由於東方國家觀念與革命思想的滋長。如今，這件事實已經成爲莫斯科街談巷議的一個時髦題目了。

要斷定：亞洲中部的民族運動或革命運動的滋長，有幾成是由於歐洲思想無法阻止的侵入，有幾成是由於布爾塞維克宣傳與其有意的干涉，是乃英蘇關係

上，英國方面的難題。我們要記得：布爾塞維克當外國干涉與內戰過去的時候，曾經一度在巴庫召集一東方民族會議，當時席上便宣佈『對大英帝國主義的神聖戰爭』。不過這是一種示威而不是什麼政策的宣佈。後來布爾塞維克也曉得這樣未免太過輕率有害無益，因而從此就不敢再嘗試了。不過東方國家觀念的勃興，已然是一種完成的事實，而同時，除非是痴子，誰都不能相信帝國主義的種種極度的鬆散還有挽回的可能。因此，僅僅布爾塞維克宣傳問題，或者是僅僅蘇聯政府與共產國際在組織上的關係問題，已不是最關緊要的事情，雖然仍不無相當的重要。在東方，政治上的衝突也同樣地化爲經濟上的問題，且在彼處，馬克斯的診斷，還沒有失敗，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拿英國如今對於印度的目標來講，英國只是想維護其既得之政治利權所保證之經濟利益而已，她無意攔擋那種民族思想的潮流。

一個民族處於外國統治下或處於外國勢力下的狀態已臨至壽終的時期了。雖然，死亡的情形，各有不同。外來的勢力足以促長或延緩一國的民族熱望，可是決不能創造牠們。倘使藉口布爾塞維主義大有侵染印度可能而採取高壓政策，那是再愚蠢不過的事情，因為倘使真的依此而行，恐怕不用幾個月，內戰便會發生於印度。中國革命的那回事，說起來倒是很饒興趣的，不過我們未便在此詳細論述了。查中國革命的中途流產及其所以會發生那種慘殺事情者，實由於布爾塞維克站在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組織後而爲其支撐，有以致之；但英國人却不能因中國革命影響到他們的商業利益與對華貿易而來歸責蘇聯。從外國剝削方面着眼，民族運動與革命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英國人在亞洲的奮鬥端在英國經濟利益的保持一點。實際上，這並不是英國人和布爾塞維主義的決鬥那麼一回事，而是英國人，和最後帝國主義還是不得不向牠讓步的民族運動勢力的決鬥；雖然在形式

上，前一種的情形是似是而非的，因為英國對於蘇聯的東方政策的加意提防就如防賊一樣的。英國與蘇聯間接觸的主要現象，由阿富汗與波斯的那件事可以窺見其一斑。

阿富汗與波斯是介乎印度與俄羅斯土耳其斯坦間的緩衝國。牠們一面是印度的屏障，而同時也就是英國與蘇聯間爭了許久的一方土地，好比二犬爭食的一塊舊肉骨頭。自從大戰以降，牠們國內的各種把戲，層出叠現真鬧得無法開交，一會兒是鬧英國壓迫，一會兒又是與英國言歸於好，這一邊講民族主義政治，那一邊講商業貿易條約，此外尚有軍事行動與蘇聯的傳道熱情等等，以助其勢，真是可謂集熱鬧之大成了。如今牠們都是獨立國，但是不消說，牠們仍舊都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同時在牠們的政治行為當中，也都映出蘇聯政體對於東方的衝擊及『布爾塞維克主義之威脅』所予英國外交方式的新轉向。如今牠們不止享有形式

上的獨立了，一則是因為牠們都已到了可以獨立的時期，一則是因為英國深恐蘇聯制度的吸引力太大。不過牠們至今仍舊是印度的緩衝區域。牠們不僅是軍事上的緩衝區域，同時也是——或是說，已被人用作——預防無產階級叛變的傳播及普通社會革命思潮的埋伏於印度民衆心中的一個屏障。

這個故事的前前後後，至為複雜，此處為篇幅所限，不能作詳密的敘述了。阿富汗於一九一九年獲得完全的獨立，不到兩年之後，蘇聯與阿富汗間便締結了一個條約。這個條約關於政治方面的規定是很教印度政府感覺不便的，因為印度政府一向在關心牠的西北邊境，因而對於阿滿努拉 (Amannullah) 也就不時地暗送秋波，或自動地給予財政上的幫助。阿滿努拉所計劃的改革顯然是受了蘇維埃土耳其斯坦模樣的影響的。專就這些改革本身而論，我們實在不能不佩服。只是如次的兩點，一是關於其起源的種種情形，二是因其勢力頗有侵入印度邊疆可能

的緣故，印度政府均深置不滿。後來，阿滿努拉關於組織一健全中央政府的政策宣告失敗，印度當然是喜歎得手舞足蹈了。阿滿努拉一下台，英國對於阿富汗的政事，一時又可擺佈自如了。

在波斯方面，布爾塞維克們極敏捷而又極聰明地一把抓住了他們的機會。差不多緊跟着蘇俄革命之後，他們便宣言願將俄羅斯於一九〇七年在波斯所取得的條約上的利益一筆勾銷。波斯原本是干涉時期協約國軍隊的根據地，因此，布爾塞維克這樣地買好是於己很為有利的。到一九二一年的開始，波斯便與蘇聯簽定了一個條約，內中除載明予波斯以上述的利益外，更有聲明所有波斯欠沙皇政府的債款以及俄國所有在波斯既得之公私利權統歸無效的規定。爲了蘇聯與波蘭間之關係的日趨親密，與蘇聯在阿富汗的努力的活動，才有寇仁爵士於一九二三年五月間向蘇聯遞送英國「哀的美頓書」以斷絕國交爲最後恐嚇的那麼一回事。英

國的這一舉動，倒獲得相當的效果；英國所要求的『端莊行爲』（Good behavior）蘇聯也答應了。可是英國利益在在與波斯國中的反帝國主義思想抵觸，並不因此而得解決的途徑，而在另一方面，蘇聯在波斯的勢力也不因此而受多大的挫折。關於後一事的再好不過的證明便是蘇聯與波斯間貿易的大大增加與一九二七年的各守中立條約。

英國與蘇聯之所以在波斯拼命爭強者，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關於煤油的事業。英波煤油公司所得的煤油利權乃是英國在波斯所享有的最重大最有價值的東西。當然，蘇聯並不希罕波斯境內的煤油，高加索區域的煤油埋藏不知多少，牠是全世界出產煤油最多的地方。當干涉初期，英國在高加索及巴庫巴統（Baku-Batum）礦苗的煤油業，所受損失，佔全筆干涉賬中的一大項。如今俄國煤油出產組合的競爭，又要教英國政府（也就是教那政府經營的英波煤油公

司)疾首蹙額設法對付了。關於煤油的複雜政治，其對於歐洲與蘇聯間關係的發展，以及其對於歐洲孟什維克黨與反革命騷動等的影響，乃蘇聯作家的中意題目，如愛勒余斯·托爾斯泰(Alexis Tolstoy)的那本命名黑金(Black Gold)的小說便是一個很好的實例。蘇聯的煤油業，雖還沒有取得國際通商當中之首要地位，可是俄國煤油出產組合已能逼着在英國的各煤油批發聯合機關接收牠的三年為期的銷售合同，我們能把此事放過而不加以注意嗎？

我們怎樣來總結以上所說英國與蘇聯關係的目前狀況呢？再者，牠與戰爭的前途，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普通情形之下，果凡一切大驚小怪或言過其實的事情，都無法使人原諒。彼此的同仇敵愾並沒有消滅。倫敦與莫斯科之間雖時聞爭吵之聲，但是習以為常，也就沒有什麼大關係了。歐洲政治千頭萬緒紊亂不堪的關係並未曾給予英蘇

間的和平以新的危機。無論如何，亞洲一方面的衝突是比較露骨的，雖然說在過去的近年當中，幸未有任何古怪的事件發生。可是最糟的是今日的情形不能說普通。英國現在是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也在所謂『空前的經濟恐慌』、『工業凋零』、或『經濟風波』的惡運。最聰明的方法還是立刻爽爽快快地承認：現在這個資本主義關係之制度的逐漸崩潰。這崩潰或者是爲時比較很長的，不過一旦這崩潰到了最後的一幕，則全球只有蘇俄一國是前途光明的。到那時，英國爲情勢所逼，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而實行一種平常的帝國主義政策。這種帝國主義政策便是圖取殖民地利益與『勢力範圍』，和企謀『帝國內較密切之經濟統一』的政策。英國爲的要取得其生存的給養，便須保持她的東方市場，也許她最後逼不得已還是要藉着武力來彈壓東方的社會革命運動。關於這些事情，英國與布爾塞維主義怎樣也無法妥協。這種妥協簡直是不可能的。布爾塞維主義在本質上就好比

一枝專來蕩平經濟國家主義勢力的十字軍；經濟壓迫，在布爾塞維克們看來，是最大的罪惡。因為不景氣的程度日形加重而我們又竭力設法避免全盤的傾覆，妥協的不可能便越加顯明。如今反對布爾塞維克宣傳的表示，範圍更加擴大了。在上院和下院，關於蘇聯牛油、蘇聯木料、蘇聯煤油、蘇聯用煤、蘇聯糖果，以及其他等等的問題，竟能佔去議會的全部時間。英國恐怕也要得到一種戰爭心理，以與蘇聯的戰爭心理對立。究竟這句話是否將取為實在的形式，則須取決於多種不同的條件。第一，這要看歐洲旁的地方有什麼事情發生。第二，這要看歐洲經濟沒落的速率如何。第三，這要看到什麼時候法國覺得被刺痛了。最後一件，這或者要看：如果歐洲實行軍縮的話，軍縮的程度如何。

六

現在還有一種對於蘇聯的關係，我們要在這裡提一提。日本對於布爾塞維主義的態度是根據多種不同的利益的。這多種不同的利益，實在沒有一種是與歐洲政治有逼切之關係，不過牠們都足以助成歐洲對抗蘇聯的戰爭。

日本國內如今見着非常疾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她不歡迎那種共產主義的學說。她一向便抱有奪取滿洲與蒙古的野心。日本一向是準備剝削中國，因此蘇聯對於中國的同情表示自爲日本所不滿。因爲這些同情表示或足以促成中國革命。還有一點就是：日俄原是世仇，蘇聯內戰時，日本曾在青天白日之下毫無顧忌地表現其貪慾，很想乘隙而入，因此這種世仇的關係又曾一度加深。在表面上看來，蘇聯與日本很可以相安無事，但如今牠們之間已存有種種的糾葛，故情形也很爲可慮。蘇聯因爲泡定息事寧人的主意，乃不惜以在薩哈連島北部貴重的煤油與煤的利權讓給日本，藉以緩和兩國間的惡劣空氣，不過日本的經濟狀況已到

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這一點與顯然是無濟於事的。滿洲鐵路更是東京之貪得無厭的對象。

最近日本在彼處的行動及其向中國無所顧忌大事拖延的進攻，大半即由於滿洲鐵路的吸引，有以致之，無可疑義。好在旁邊還有個華盛頓，滿懷忌妒在看待日本在遠東的陰謀，不然，東京對於滿洲的策略還要霸道了。如今日本唯一的顧慮乃是美國而不是蘇聯。自從一九一七年之末直至如今，情形沒有改過。

日本不屬於歐洲。不過倘使日本進攻西伯利亞，歐洲大概不會不贊成的。日本當前的經濟問題似乎無法解決了，所以她面前只有向中國或西伯利亞伸展的一條出路。如果日本有意助成歐洲的計劃，那末她也一定很可以得到一些好處的。

七

以上是蘇聯與歐洲各國間衝突的一個梗概，現在我們要把與蘇聯有關的國際條約，尤其是關於和平條約中立保障之類，作一鳥瞰。蘇聯對於歐洲軍縮的努力，我們可以同時來敘述。

一九二一年三月的英俄通商協約打破了蘇聯一直爲人隔絕的局面，雖然英國當時並無正式承認蘇聯政府的意思。這樣一來，各國便看英國的榜樣，而與蘇聯簽訂相仿的商約，就在這一年，這種條約一共簽了不止十種。次年，一九二二，乃是討論世界和平與經濟繁榮的國際會議的偉大的一年。四月至五月的日內瓦會議，蘇聯也被邀參加，而在會議當中，各國也的確非常注意歐洲與蘇聯間之經濟合作一事。蘇聯代表與法國代表的一場決鬥非但饒有興趣，而且頗多含意。齊林聲言道，蘇聯政府極願盡力幫助歐洲經濟的改建。蘇俄的富源多未開發；「經濟協作所需之法律上的保證」也不缺短。但戰爭的威脅卻是這種經濟改建的致命

傷，這位人民委員接着說道，所以在這會議的進行中，蘇聯代表一心的提議實行『軍備的一般限制』，尤其是空中作戰與逼人停止呼吸的瓦斯的使用，非即刻廢除不可。於是就輪到巴爾壽(M. Barthou)發言。他站了起來。他說：蘇聯代表方面所有對於提出軍縮問題的企圖，不但要遭遇法國代表方面的保留案與抗議，而且必為後者所堅決反對。巴爾壽堅持聲言：軍縮問題是議事程序中所沒有的。所以應勿庸議。

日內瓦的成績渺茫得很，這也是並不希奇的。英法二國太看重牠們從前借給沙皇政府的債款和牠們更加關心的各種財產與既得利權，牠們只希望能與蘇聯政府謀得相當的解決。但是從日內瓦，却產生了德蘇間的雷巴盧條約。德蘇二國的連合乃是下面的兩件事情所促成的：一、凡爾賽條約的不公，二、德蘇二國的地理關係。雷巴盧條約就好比牠們二國攜手合作的第一個鏈環。牠予德國以『最惠

國」待遇。牠實在是友好關係與經濟合作的堅固基礎。在蘇聯看來，借款與賠償要求的一概放棄，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後來日內瓦的討論又在海牙舊事重提，這時上述的重要意義方才顯示於人。於是所有那些麻煩的債務問題，外國在俄之油業及礦業利益問題，幫助蘇聯政府償還沙皇政府之對外借款問題，又提了出來，大開其辯論會；但是結果除失敗外一無所得。德國在雷巴盧所承認的原則，在這回的交涉中，大可以利用了。

同年年底便是莫斯科軍縮會議的開幕。莫斯科召集這個會議的目的即在促進其與各鄰國間的邦交。被邀的有波蘭、羅馬尼亞（未接受請帖）、愛沙尼亞、拉多維亞、立陶宛、及芬蘭等國，至列強則一概未被邀請。這個會議實際上的結果也是渺茫得很，簡直一點成績沒有，而蘇聯與波蘭間的關係倒反而因此受了不好的影響。

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這個期間當中，蘇聯屢次向歐洲各國提議召開一純粹討論軍縮問題的會議（意思就是在國聯的範圍之外召集這樣的一次會議，因為蘇俄不是國聯的會員國）。不久就是羅加諾會議的出現。在這個會議當中英國做了法德二國間的中間人。布爾塞維克認為羅加諾條約不啻歐洲與蘇聯根本對敵的表示，他們感覺到該約對於他們的威迫。布爾塞維克聲辯道：這是改變德國固有政策的戲法，他們想拆散蘇聯與德國間的友好關係，教唆德國不要去理雷巴盧條約的規定，他們想把德國拉入西歐各國的集團，在國聯蒙罩之下欺人耳目的軍事主義與不務實際當中一塊瞎混。布爾塞維克竭力反對德國的簽字並聲駁英國因催促德國簽字所提出的理由。在羅加諾會議進行當中，聯盟約章的第十六條最使布爾塞維克引為憂慮，同時他們所以見不着羅加諾條約的好處，也即為此，因而這便成了礙難分解的辯論目標。羅加諾條約確定了德國加入國聯的那回事。盟約第

十六條是規定：凡爲聯盟會員國『均有便利其他任何聯盟會員國軍隊因協力維護盟約而假道經過其國土』之義務。簡單一句話，這就是說，一旦波蘭出兵進攻蘇聯，法國不止可獲有種種方便來援助波蘭，她簡直可以利用整個國聯的勢力了。大概蘇聯即因此而坐臥不安，所以後來對於這第十六條在羅加諾附加的空泛含糊的解釋，難以消滅蘇聯的畏懼。這個解釋後來被列在如下的註文當中：

『各聯盟會員國有爲維護盟約而忠心盡力合作並抵抗任何侵略至相當程度的義務，至抵抗之程度，則應視其自身之軍事情形及地理關係而定。』

一九二六年四月間，德國與蘇聯所簽訂之柏林條約就好比是意在向上述那種奇異約文而發的一聲回響。該約重復確認雷巴盧條約爲兩國相互關係的基礎。該約聲明遇一國被第三國攻擊時，其他一國應保守中立，又無論平時或戰時，任何一國均不得協助對其他一國而施之任何經濟或財政抵制。同時，斯脫來斯曼曾有

大意約如以下的聲明；德國的簽認柏林條約，與其對於國聯的義務，毫無抵觸之處。

布爾塞維克認為在一方面，柏林條約是一種政治的打擊。在另一方面，牠對於歐洲政治復具有一種包含破壞性的特殊影響。蘇聯主張實行軍縮，她不主張締結聯盟，而其他國家則頗有彼此合夥的表徵。柏林條約對於歐洲軍縮上非但沒有幫助，而且還推波助瀾促使戰事風雲益趨濃厚。據說羅加諾會議的最大弱點，也就在此。柏林條約自然予法國之『安全』學說以重大打擊。無奈蘇聯的主張沒有人出來擁護，像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所召集的國聯軍縮籌備委員會第四屆會議的一般空氣，就足夠使蘇聯失望，蘇聯的種種提議至多博得各國代表的正席靜聽而已。李維諾夫的『立時實行全體解除武裝』計劃未免近於空想，故在一方面，當然獲得其所應得的反應，但在另一方面，則却又被人當作布爾塞維克之伎倆看

待，因而無人願予贊助，其實這倒是的確的事，雖然這計劃的優點，我們也不能一筆抹殺。自此以後，蘇聯會屢次在日內瓦提議實行有力的軍縮，但是總沒有什麼成效可言。聯盟承認：這些提議是很够理想化的，牠們值得提出考慮，牠們當然顯示渴望和平的熱忱。但是聯盟復確定道：可惜牠們不實在。於是什麼事都完了。繼着第四屆會議而開的還有第五屆、第六屆。布爾塞維克說：聯盟不過是在使軍備競爭成爲更加平常的一個機關而已。

非戰公約便是蘇聯參加國際和平宣傳的最末一個階段。當初有一個時期，莫斯科充滿反對參加的聲浪，人們說：訂立一張公約——即「一紙空文」——是一件事，軍縮是另一件事，蘇聯可不高興撫育一種空虛的安全。該約準許爲自衛而戰爭，當然暗示已經有一個侵略者的意思，這且不說，美國之干預歐洲政事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蘇聯應該加入該約還有一種原因，就是：她的鄰邦若都拒絕

加入。那末就得有某種的結果發生。因此，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便有所謂附加於非戰公約的李維諾夫草約的簽訂，簽字者有：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諸國。

目下的情形就是這樣。在過去，和平條約與保守中立的協定不知簽了多少，也不知毀壞了多少。在我們目下這樣一個充滿競爭心理與戰爭空氣的世界當中，上述的種種條約，就牠們本身而論，簡直都形同廢物，我們這樣說，實在不算太過。就算撇開資本主義與經濟恐慌不說，除非實行軍縮，和平必無望。歐洲各列強既然已在全副武裝的備戰了，和平將從那裏來？在目下的經濟混亂狀態之下，還偏要裝作地說和平有望，是算什麼意思呢？

四 和平的展望

關於第二次大戰現在可以預料得到的大概情形，我們不必再事發揮了。關於這場戰禍理想中的恐怖，最近已有不少文人加以敘述。這一場的決鬥必定是產生在所謂文明的人們當中。心懷寬大的人們，當無事的時候，不妨把從歐洲文明所演化出來的種種殺人與破壞的最新方法，默默地思索一番。

衆人皆知：人類和羊，很有相同的地方。當人們爲某種普遍的恐怖所激刺時，他們便大都失去識別力而趨向盲從之一途，在戰爭緊逼或戰爭業已來到的時

候，他們就會像羊羣的驚奔四走。如今大多數的人已經感覺到這一點，就是：戰爭的黑影已觸目皆是佈滿全歐了。

在國際會議席上各國間所表示的美感，不足以消滅戰爭的原因。那些對於軍備增加，毫無實際約束效力的非戰的承諾也不足以消滅戰爭的原因。一部分的軍縮也同樣地無能為力。雖然如此，在某種程度上的軍縮，却實在是目下的急務。到了現在的地步，牠倒是唯一的救濟了。

是的，經濟國家主義間的種種衝突不會因軍縮而變更；歐洲資本主義關係的制度的日形崩潰必照舊繼續下去；資本主義形式的社會與社會主義形式的社會必仍舊呈現根本的矛盾；歐洲對蘇聯的敵視與蘇聯對歐洲的侮慢，也必依舊存在着。但是要想避免戰爭在最近的將來爆發，除了實行軍縮外，別無善策。完全解除武裝當然是近乎「烏托邦」的，日內瓦和他處的軍事代表都異口同聲地好這樣

說，而各國的陸軍將官和海軍將官們更是爲職責的關係而不得不這樣說。假如現社會不是這般地瘋狂，我們原可不必如現在的恐懼猜疑。歐洲軍備的實行大減不能說是『烏托邦』的。這乃是歐洲死裏逃生唯一的出路。

專就共產黨的預測而言，有三項特別情形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對於戰爭的恐懼要算在蘇聯最爲濃厚，雖然，蘇聯的恐懼却較近乎情理，何以呢？因爲先爲人攻擊，繼則被人屏逐威嚇，再又爲人視作社會當中的危險物——比較從前更加危險——等到最後本身的地位已更形堅固而對方的地位則日見動搖，到那時，若謂對方時時刻刻都有重整旗鼓再來進攻的可能，實在不能算不合理。這是第一件事。其次就是在布爾塞維克對於世界革命的信仰。在世界各國，由一個社會秩序到另一個社會秩序，沒有一次是由於良心的驅使，或是取決於委員會的議決案的；按照馬克斯的學說，沒有統治階級肯自願委棄其權力的。社會革命的最通帶

的路徑就是戰爭；戰爭亦即是社會革命之最通常的先驅。這是第二件事。

如今要特別注意的乃是第三件亦即是最末的一件事情。老實的說，在當今的歐洲局面當中，舉凡一切可為戰爭原因的，牠可算十分齊全了。可是馬克斯的經濟學及其政治哲學都不是絕對不怕戲謔的，而且在布爾塞維克心理學的盔甲上面也有破裂的地方。在經濟組織的範疇之內，因果的程序可為純粹機械化的，不過同樣機械化的程序不見得限制住人類的行為。歐洲戰爭的原因的確存在着，牠們不但是真實的，而且是為數很多。現在則尤倍增不已，至於根本的大原因即經濟的凋殘，則更如人患毒癰，瞬間散佈，全身無法抵禦。雖然如此，但並非戰爭便必定不可避免。我們姑且把唯物主義的哲學、經濟決定主義、自由意志以及其他問題擱開不論，我們相信一般老百姓儘可自由採擇其對戰爭政策之適宜態度的。

有許多事情是布爾塞維克們應該捫心自問的。共產黨的狂信與武斷，共產黨

對於干預外國政事的熱情，共產黨對於資產階級之設施過火的侮慢與譏諷，共產黨的由訓練養成的苛刻，共產黨對於蘇聯個人自由的觀念——這種觀念即釋為從哲學方面和行政方面下手的對於自由的剝奪，亦似無不可——以上種種在蘇聯對歐政策上均曾作過有以促成某種本可以不必有的危機的貢獻。實在其咎難辭。不幸，最危險的倒是：共產黨對於戰爭恐懼的呼聲，和牠對於戰爭預測的喧譁吶喊，雖然這些事情我們都無法了解。共產黨不但打算對於蘇聯的『道德動員』(Moral Mobilization)的國外反應，置若罔聞，即對於其在國內的影響，牠也預備視若無睹。而且到了緊急的時候，原已存於蘇聯民衆當中的那種濃厚的國家觀念的熱情，也大有流露開來而變為政治領袖慾的激刺的可能，這一點，我們不能忽視。在蘇聯民衆當中如今固然還沒有戰爭的動機，但是將來如何，則誰能保證呢？

現在我們所有的希望都在實行軍縮的一事上了，因為軍縮是那些窮兵黷武的國家之間表示和平的唯一無二的有效方法。這件事情可以馬上就在日內瓦進行。實行軍縮比較恢復世界經濟平衡容易得多。布爾塞維克們已預先看到這種平衡的無法維持，整個的崩潰遲早總歸是要發生的，而預見及此同時更相信一直為人類文明服務以至今日的這個制度的破裂，已經是大勢已去不及挽救的，也實在不限於布爾塞維克這一班人。布爾塞維克們說：什麼債款啦、賠款啦、關稅啦、金價啦，這些全都是要不得的東西。可是要將所有的債款一筆勾銷，這恐怕辦不到；第一個法國不肯，至於美國，也不能贊同，不過誰又都沒有強制執行的勇氣。至於廢除關稅，那更簡直是辦不到，因為此舉對於目下經濟制度的挫傷至少與關稅的維持相仿。經濟的和平與昌盛，還是要等待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誕生。

目下歐洲外交最急迫的問題當中，其一便是德國的政治情形。我們要問：什

麼事情就要發生呢？下一次的德國政府，必定代表全國人民的意思而宣佈其否認一切債務的政策。這是法國肯接收的嗎？希特勒是否將由威廉街把政策宣佈出來呢？再者，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對於德國的安全，又該作如何的舉動呢？假使德國忽然大鬧共產革命，成功與否且不計，可是法國將採何種態度呢？（據許多公正的觀察家說，這種事情也是望得見的了。）但是成功也許是要看德國共產黨由蘇聯的人民方面所能得到的助力如何。蘇聯政府當然是嚴格地保持中立，但是牠可能約束住那幾萬幾十萬自告奮勇的人民，不許他們去爲德國的革命效力戰場，不許他們爲其犧牲，並且撫育牠嗎？或是誠如眼光比較更加遠大的共產黨的看法，蘇聯政府，在德國共產革命成爲事實以前，決不干預其事嗎？不過假使蘇聯政府不保持中立的話，法國對於這種投機主義將作如何的反應呢？波蘭要作如何的反應呢？英國對於蘇聯與法國又將採取何種態度呢？像這樣的問題真是不勝

枚舉。

目下在防止戰事方面只剩實行軍縮的一個方法，除此之外，沒有第二個法門。假定在歐洲各國當中，每一國減去軍備百分之二十五還嫌太少，那有什麼，只要大家集合起來定出我們的勇氣和常識都允許的最高的一個標準就是了。比方說，百分之五十太高嗎？百分之四五呢？就算以百分之二十五為軍縮的標準，也無不可，不過有一層，到最後，危險性還是比較大一點。蘇聯提倡立刻完全解除武裝，她這樣地提議固然還是為的自利而不是為的唯心主義，但是無害於人的自利有什麼不好呢？

英國必須領頭，使歐洲恢復到文明和神清氣爽的狀態。這句話，在英國已經喊了幾久。軍縮會議就是他們的機會，他們可以領着頭，他們可以做出一個實在的好模樣，這倒未嘗不是美國獨有的好運氣。



在作者寫此文時，關於軍縮的預兆，真不算十分好。在莫斯科，差不多祇有懷疑，蘇聯代表團不敢希望日內瓦能有什麼成績，因為他們深信反蘇聯的戰爭已近在目前，同時歐洲各國定必再度地聯絡戰線，來推翻蘇聯的提案。在法國，則最近有上議院之外交與軍事二委員會對於「五年計劃」的軍事部分的充滿色彩的聯名報告書，該報告書內有將上述一事在日內瓦提出討論的提議。不過在另一方面，還有一線光明。所有英國關於實行軍縮的澈底計劃的提案當不獨可以得到蘇聯代表團的擁護，而且還可希望德意二國的贊助。這便是英國退一步的希望及其實力的來源。表示好意的一套老把戲，總得有一個完的時候；軍備競賽的浪費，總得有一個完的時候，蘇聯與歐洲之間互相猜忌，暗中各自備戰，也總得有一個完的時候。布爾塞維克跟那些資產階級儘可在日內瓦雄辯一番，打個落花流水。他們儘可隨意選擇無論何種的決鬥方式，只要不回到真的戰爭上面來就行。倘使

這都做不到，那末我們老百姓還是趕緊挖地道，往下挖牠幾十丈不嫌深，預備好了食糧，俾大臨難頭時，有一個避身之所能。

蘇俄底文學

弗里曼、庫尼茲合著
鍾敬之翻譯

全書計三百頁

實價大洋八角

最近出版

俄國的十月革命，不僅是在政治上建立了蘇維埃聯邦政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在社會的意識形態方面，一樣引起了莫大的變革。因此，應響之及於文學與藝術的，也產生了新的突進，和新的理論和形式。這就是蘇俄大革命所給與的特質。在本書內便儘量地宣示出來了。本書首先說明蘇俄藝術的過去和現在，就是蘇俄藝術，歷史的發展之跡，其次則申述蘇俄文學作家及其作品。對於蘇俄文學的鬥爭現狀，加以詳盡的檢討和研究。誠為欲明瞭蘇俄現代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新生命書局發行

上海南京路
北平
武昌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廿五日出版

蘇聯與第一次大戰

(社會與教育社叢書之十三)

——實價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著者 蔡葵士

翻譯者 方正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新生命書局
北平琉璃廠 新生命書局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578

